

2023 年第 1 期总第 57 期

财经参考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图书馆主办



财经参考

2023 年第 1 期·总第 57 期

国际财经

硅谷银行风波会酿成一场“完美风暴”吗？	1
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继续增强	3
美国制造业的“假衰落”和“真困境”	5
大国博弈中的中美贸易与投资合作	12

国内财经

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论厉以宁的经济学贡献	14
金融改革化险应“防未病”“治已病”有效结合	22
高储蓄之谜：疫情、恒久收入预期角度	26

新闻快讯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时强调正确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参加看望和讨论	29
迈向现代化强国的发展密码——《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时代特质和实践价值》智库报告解析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科学指南	30
外媒述评：两会稳经济部署广受关注	34

财经参考

国际财经

硅谷银行风波会酿成一场“完美风暴”吗？

来源： FT 中文网 (2023-03-13)

作者： 黄凡

近日，“美国硅谷银行关门”的消息非常抓眼球。一些中文媒体用“又一个雷曼时刻”（曾引发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啸）来形容目前的金融市场。那么，究竟硅谷银行风波是如何发生的？对全球金融体系以及金融市场的影响又有多大？

一、硅谷银行的背景

硅谷银行 1983 年成立于美国，是硅谷银行金融集团的子公司，资产达到 50 亿美元，并通过位于美国的 27 家办事处，3 家国际分公司以及在亚洲、欧洲、印度和以色列的广泛商业关系网，为风险资本以及创业企业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贷款。硅谷银行主要服务于科技型企业，曾成功帮助过 Facebook、Twitter 等明星企业。由于硅谷银行在 2012 年与浦发银行合资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家专注于服务科技创新产业的合资银行——浦发硅谷银行”，因此其名字也广为国内专业人士所熟悉。

二、硅谷银行风波的根源

硅谷银行是一家不设零售业务的中小型银行，过去专注于 PE/VC 和科技型企业融资支持。小日子一直过得挺滋润。

在 2020 年初的疫情后，美联储为支持经济而降息到零并无限 QE 放水，科技型企业一度也风光无限，资金多了也就投桃报李地存在硅谷银行，硅谷银行支付零息而取得了大量宝贵的活期存款，真是高兴还来不及呢。为了产生“稳健”的收益，银行就把这些资金投向被认为是非常安全可靠的美国长期国债以及政府背书的 MBS（抵押资产支持证券），以获得 2-3% 的年化回报。本来认为是稳赚不赔的买卖。结果没想到，这种短期资金（银行活期存款）对应长期投资（长期安全债券）的期限错配，为今日的大风波埋下了伏笔。

去年以来，全球通胀持续，美联储为了控制通胀而持续大力加息，到今年 3 月初，代表美元无风险收益水平的美联储利率已经接近 5%。硅谷银行的储户们一看外面的无风险收益（货币市场基金）可以差不多有 5%，于是纷纷提取资金去投资，硅谷银行的客户存款余额于是大幅下降，为应对客户的取款，硅谷银行只有去变卖原来投到长期美债的资产了；另一方面，美债价格随着市场利率的上涨而下降，尽管债券本身几乎没有信用风险，持有到期是可以等到本息归还的，可是，为了应对客户取款而被迫急售，硅谷银行就必须接受折价卖债而亏损了。根据公开报道，硅谷银行几日前的第一笔卖债就亏了 18 亿美金，于是，硅谷银行马上希望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来补充 22.5 亿美元资本，然而，融资计划失败了。如果客户继续把储蓄提走，银行最终要被迫把持有的所有债券卖出，预期亏损高达

150 亿美元，这个亏损金额足够把这家银行的所有资本金清零了。

当地时间 3 月 10 日，根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发布声明，美国加州金融保护和创新部（DFPI）当日宣布关闭美国硅谷银行，并任命 FDIC 为破产管理人。

为保护投保的储户，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创建了存款保险国家银行（DINB），硅谷银行在关闭时，作为接管人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需立即将硅谷银行所有受保存款转移到 DINB。

SVB 看来是一个银行资产负债管理风险控制的很好的案例。表面上看，零利率的吸存，投资到无风险的政府背书债券。套利模式完美。没想到，正是这种短期负债对长期资产的配置失衡，一旦利率环境改变，流动性出问题了。就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困境中。

三、硅谷银行事件影响几何？

风波出现后，SVB 的众多储户开始夺路而逃，希望将存款取出并转存到其他规模更大的银行，例如花旗、汇丰等。有资料显示，美国金融服务和金融科技公司 Brex 周四（3 月 9 日）从硅谷银行收到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一位直接了解情况的人士说，Brex 周四开设了数千个新账户，总计流入数十亿美元。摩根大通、富国、摩根士丹利等其他大机构的资金流入近日也有所增加。

就储户的损失而言，看来还是相对可控的。尽管目前暂不清楚有该银行有多少个人储户，一般来说，个人储户中存款金额在 25 万美元以上的不多，只要在 25 万美元以内的，美国存款保险制度会全额赔付，但一些公开上市的企业储户就明显遇上一些麻烦了，因为股价暴跌，不得不公开其对硅谷银行的存款情况。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大部分企业称“影响有限”，企业存款多为数千万美元（折合人民币数亿元不等），当然也有个别公司公布多达 26% 的现金及等价物还在硅谷银行里面，能最终拿回多少并不确定。

硅谷银行关门事件也引发了市场剧烈动荡，标普 500 指数一周累跌 4.55%，创 2022 年 9 月下旬以来最大单周跌幅。而且美国银行股的抛售潮也蔓延至欧洲，德意志银行、法国兴业银行、汇丰银行、瑞士信贷等欧洲大行的股价也均显著下跌。

不少投资者担心又一场金融风暴会来临。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当天也召集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货币监理署的领导人举行会议，讨论围绕硅谷银行的事态发展。耶伦称，美国的银行系统“依旧坚韧”，监管机构拥有有效的工具来应对硅谷银行危机。

我也认为，硅谷银行风波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有限，基于以下理由：

1) 根据上市公司财报，硅谷银行截至去年年底的总资产约为 2090 亿美元，客户存款（负债）总额约为 1754 亿美元。总量有限，不至于对美国金融系统构成系统性风险。

2) 因为各大银行的经营多元化，它们经营的投资银行业务、资产与财富管理业务、托管业务等均不太受利率变化影响；而且大银行存款来源有多样性，不像硅谷银行高度集中在一个行业，因此受利率变动时资产负债管理腾挪空间较大。

3) 大型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在监管的强要求下，在 2008 年金融风暴以来一直持续得到加强，有利于抵御新一轮潜在的金融风暴。

其实，小银行倒闭在美国司空见惯了，当硅谷银行出现流动性问题时，消息在《纽约时报》的商业版都上不了头条，直到银行被接管而关门时，才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

财政部也官宣银行系统“依然充满活力”，与 2008 年危机时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完全有信心”，监管部门能利用有效工具、采取适当行动，来应对此类事件。

个人认为，美股近期的持续下跌有部分是基于硅谷银行风波的影响，但更主要是基于对美联储加息力度继续的预期，因此如果是美股继续受硅谷银行事件余波的影响而下跌或许是增加美股配置的机会。

作为个人投资人，我认为更应该吸取硅谷银行的教训。以避免在这一轮利率快速上升中陷入险境。事实上，不少在海外投资理财的高净值客户在他们理财顾问的建议下在过去几年也进行了大量如硅谷银行类似的“神操作”：利用美元低利率的“机会”，向银行借钱（借一个月到三个月的期限然后反复展期），买入收益相对较高的长期所谓“安全债券”。美其名曰：无风险套利。结果现在美元利率飙升，借款成本也随之急升，另外一端的长期债券价格同时下跌。结果陷入了与硅谷银行一样的困境而难以自拔。

金融市场的经营者与投资人一样，时刻面对着各种不同的风险，有可见的，也有不可见的。为了避免掉入陷阱之中，就必须牢记“天上从不掉馅饼”常识，自觉与各种所谓的“无风险套利”，“低风险也能赚高收益”的神话保持距离，以免为了“捡馅饼”而掉入陷阱之中并遭受损失。

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继续增强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2023-01-29)

作者： 东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2023 年全球经济将延续 2022 年的放缓趋势，呈现温和衰退；全球通货膨胀率有望下降，但仍将高于国际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受全球经济增速下滑、地缘政治冲突等影响，世界贸易前景也难言乐观。总体来看，今年全球经济仍面临不小的挑战，但调整过程同时孕育着复苏动力，各国需通过多边合作来加强经济协调，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在经历了 2022 年全球经济增速的显著下滑后，2023 年全球经济复苏面临较大压力。地缘政治冲突、疫情的不确定性、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经济刺激政策激进退出的溢出效应等一系列外部冲击因素依旧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全球经济继续处于不稳定和波动时期。

与此同时，2023 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促进增长的宏观政策、全球产业链的恢复、数字经济等新经济模式的发展、全球国际合作的推进等，为世界经济逐步回归低速增长的轨道酝酿动力。

一、全球经济将呈现温和衰退

2023 年全球经济将延续 2022 年的放缓趋势，呈现温和衰退，其中上半年依旧呈现波动态势，预计下半年将有所好转。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测算，2023 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 2.5% 左右。2024 年后，全球经济有望回到低速增长的轨道。

具体到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美国经济出现实质性衰退的风险增强。美联储激进加息等紧缩性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延迟效应，而美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下行压力增大，消费后劲不足，美国经济实现“软着陆”的难度较大，在 2023 年上半年有可能出现衰退。

欧洲将出现经济衰退，能源危机的持续影响、外部需求的下降、紧缩的货币政策等使欧洲经济在 2023 年将大概率陷入增长停滞。

亚洲经济总体呈现复苏态势，中国经济实现恢复性增长。防疫政策调整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增强，但是房地产业下行、人口老龄化、外部需求不足等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日本经济缓慢复苏，但人口老龄化等内在因素使日本经济增长速度难以大幅提升，而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向、全球经济下行等外部因素使日本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印度经济继续保持较高增速，能源转型、离岸外包、制造业投资扩张等使印度经济增长速度处于较高水平，预计 2023 年增长 6.3%。

亚洲经济的复苏对于稳定全球供应链，为其他经济体提升外部需求，降低全球通货膨胀率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支撑。

二、通胀率下降但仍处高位

未来，全球通货膨胀率有望下降，但是仍将高于国际金融危机前的低通货膨胀率水平。

2022 年，为抑制通货膨胀，美联储采取激进加息政策，欧洲央行以及加拿大、瑞士、英国等国中央银行也同步采取了加息政策。与此同时，随着供应链紧张局势缓解、需求放缓、库存增加导致的价格折扣和住房价格下降需求减少等，预计全球通胀率将在 2023 年下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全球通胀率将在 2022 年底达到峰值，为 8.8%；2023 年降至 6.5%；到 2024 年降至 4.1%。总体来看，全球通胀水平仍然超过 2% 的中央银行目标水平。

全球货币和金融条件的收紧导致需求下降，并有助于逐步控制通货膨胀。美国在 2023 年着力于实现“软着陆”，在降低通胀率的同时保持一定的就业率。2022 年美国在通胀率下降的过程中没有出现失业率的大幅下降。一些公司已经意识到，解雇员工可能在短期内减少成本，但以后会产生问题，由此他们可能会转向更“欧洲”的模式，即在经济衰退期间将员工留在工资单上，以便以后能更快、更平稳地复苏。

虽然美联储 2022 年的加息已经显示出一定的效果，各种通胀指标有所缓和，但对比历史上几次相对成功的“软着陆”，可以看到，本次通胀水平较高，劳动力市场较为紧张，这些因素显示出实现“软着陆”的难度较大。

欧洲在能源危机冲击下面临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供给和需求对通胀产生双向促进作用。不过很多学者认为，欧洲通货膨胀压力在 2023 年也将逐步缓解。

三、国际贸易和金融风险增加

全球经济增速下滑、地缘政治冲突等将给世界贸易发展带来较大不确定性。世界贸易前景仍不乐观。特别是全球价值链紧张程度加深，美国安全供应链和制造业战略新布局调整，在区域经济合作中采用了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近岸外包”和“友岸制造”。这一切体现了以美国利益为中心的心态，破坏了多边贸易体制，趋向于将现有价值链格局塑造为以美国供应体系安全为中心的新格局，阻碍了全球供应链区域内和区域间的融合。

2022 年全球主要经济体采取央行同步加息以及收紧财政的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这对全球经济恢复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同时，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增加。美欧的加息政策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融资成本增加，资本外流趋势增强。而外部需求的下降使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收入降低，引发流动性不足和融资受限，使发展中国家债务风险转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增加。2023 年，由于对经济衰退的担心，部分国家可能会停止紧缩性货币政策。在 2022 年，面对美国通货膨胀的高企和通胀预期的增强，加息发挥了作用。随着通货膨胀的回落，利率上升周期或将结束。

大宗商品价格仍然存在波动风险，2023 年，预计大宗商品价格总体不会大幅下降，但将呈现波动下行的态势。能源市场供求重塑地缘政治经济格局，能源短缺问题依旧是世界各国经济复苏的重要挑战，对全球经济的稳定产生影响。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能源短缺对欧洲经济的不利影响依旧存在，欧洲经济可能处于衰退状态，高能源价格对实际收入产生不利影响，天然气价格的变化是影响欧洲发展的重要风险，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使世界经济的稳定性下降，同时低收入国家粮食危机常态化风险加剧。

总体来看，虽然通货膨胀高于历史水平、多数地区仍处于货币紧缩状态，叠加乌克兰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全球经济仍然面临挑战。与此同时，调整过程也孕育着复苏动力。一方面，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的发展引领全球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进而提升全球增长动能；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不断发展，并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助推产业数字化转型。同时，国际政策协调和国际发展合作为全球企业提供了较为良好的经营环境，并提升了对世界经济预期的预期。2022 年底，世贸组织成员实质性结束《投资便利化协定》文本谈判，67 个成员共同发表了《关于完成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谈判的宣言》，宣布达成《服务贸易国内规制参考文件》，这展示了在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复杂的当下，各国仍努力通过多边合作来加强经济协调，促进全球经济发展。

美国制造业的“假衰落”和“真困境”

来源：爱思想网(2023-03-10)

作者：马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近二十年来，美国制造业的发展变化不能简单解释为“衰落”。事实上美国政客们对就业和贸易逆差的关注掩盖了美国制造业结构性变化的事实：即通过聚焦高端制造业，各行业不同程度的集散改变，创造新型就业岗位等方式维持了核心竞争力。

但美国制造业的结构性变化也带来一系列发展中的问题，美国政府的相关政策在实际运行中仍存在未预期、非合意的结果，成为制造业发展的“真困境”：“美国创造”和“美国制造”间的“死亡谷”难跨越；发展高端制造业以维持技术优势竞争力与就业短期目标冲突难平衡；“要弹性”还是“求效率”难兼容；“大型跨国公司”和“中小企业”利益分化难兼顾。

美国是以危机驱动进步的国家，金融危机更是触发了经济社会和政府对于制造业复兴的反思，“衰弱论”逐渐形成，其真正目的是加快产业升级和质量优化，巩固竞争力和绝对优势。本文试图抛开美国政客对美国制造业衰落的叙述方式和大选中制造业议题的政治卖点，从更直接客观的指标考察美国制造业的变化，以论证美国制造业正持续增长，且竞争力在其他发达经济体中仍在前列。通过阐述美国制造业增长态势和结构变化、发展升级过程中面临的真困境，总结对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一、美国制造业真的衰落了么？

尽管美国政治极化日益严重，在大选年政治分歧更加尖锐，但至少有一点是两党共识，即“重振美国制造业”。自 1992 年以来，双方都选择了大打制造业牌。克林顿根据其公司税制改革提议，认为必须阻止美国制造业公司“向海外运送工作”；希拉里曾表明其经济计划中心是重振美国的制造业、扶持小型企业；特朗普曾宣称，美国“不再制造东西了”，“我们必须将苹果及其海外公司带回美国”。拜登也指出，“制造业工作对于支持充满活力的中产阶级至关重要”，这反映在美国制造业很多业务大规模迁徙国外，提供的就业机会锐减。

上述竞选叙述使一种观点广为认知，即近几十年来美国制造业正处于螺旋式下降阶段。其判断美国制造业衰落的标准有三：

第一，这段时期美国制造业的增长是二战来最弱时期。从纵向比较看，美国制造业整体规模的缩小。1970 年，美国制造业产值占 GDP 的 24.3%，是 2018 年的两倍。当前，美国制造业总产值占美国 GDP 的比重为 12.4%，始终无法到达 20 世纪 50 到 60 年代水平。从横向比较看，美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规模萎缩。美国制造业占世界份额从 1970 年 40%下降至 17.4%。

第二，美国制造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下降。这是美国政客最惯用的言论，也是最能引起民众对美国制造业实力担忧的论断，认为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的绝对减少，制造业在美国总体就业人数中所占份额的下降，均表明美国制造业的萎缩。1987 年，美国制造业是劳动密集型部门，制造业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68%，大大高于其他行业 56%。但 1987 年以后，其制造业中劳动力份额急剧下降。1987 年，制造业的劳动报酬占私营企业劳动报酬的 20.1%，2011 年，这一比例仅为 10.9%。与此同时，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在 1987 年至 2011 年期间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了 33.4%。2013 年，美国制造业工作机会比 1960 年减少 340 万。

第三，美国制造业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至 90 年代后期，美国制造业贸易赤字都相对较小，每年从未超过 1310 亿美元，并且从未超过 GDP 的 1.7%。1998 年之后，贸易逆差开始急剧上升，2017 年达到 5680 亿美元的峰值。有观点认为制造业贸易逆差与其就业岗位流失有关。自 2000 年以来，在贸易赤字增加的时期，整个制造业失去了 500 万个工作岗位，这进一步加深了美国制造业衰落的论证。

事实上，美国政客长期以来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关注掩盖了美国制造业基础持续扩张的重要迹象，对美国制造业贸易逆差的考量容易误读其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更直接的生产率指标表明，美国制造业并非真衰落。

（一）美国制造业的总体规模持续快速增长近 40 年

相对国内其他部门，美国制造业仍是国内领先的增长部门，生产率增长超越美国 GDP 增长速度。1960 年至 2014 年期间，美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比整个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快 1.18%，同期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比整个经济劳动生产率快 1.51%。从 2009 至 2019 年，制造业增加值占美国 GDP 比重以 2.2% 的年均速度增长，达到 2.5 万亿美元。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增长要快的多，也明显快于同一时期世界平均 1% 水平。美国制造业总产出和人均产出的增长快于整个经济增长，特别是计算机和电子产品以外的其他行业，包括运输设备、医疗设备、机械、半导体、交通设备和机动车的增速均远高于制造业的平均水平。

相对其他发达国家，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状态良好。2019 年，美国制造业产值是日本和德国总和的 2.5 倍。如 2010 年到 2019 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美国 GDP 比重增加了 2.19%，与此同时，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却下降了 0.99%。在金融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在整个美国经济重要可与日本及欧盟等主要高收入国家相比。美国制造业增长也远高于英国和法国，甚至超过中国、印度和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尽管美国制造业产出相对世界产出的占比下降，但可以看到经合组织其他所有国家的制造业产出所占份额均在下降。美国在世界制造业总产值中所占份额下降了 3.5 个百分点，至 15.3%；日本的份额从 10% 下降到 7.9%；欧元区的份额从 17.7% 下降到 13.9%；中国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所占的份额增长了 10.1 个百分点，达到 19.7%。美国政客总是指责中国制造业抢占了美国制造业的份额。从数据上看，中国制造业的确获得美国制造业部分市场份额，但中国从其他国家获得了更多的制造业份额。

（二）美国制造业生产率在提高

尽管美国制造业在绝对就业机会和美国国内就业中的比例都在下降，但这不是因为美国制造业活动萎缩，而是因为美国制造业和工人的绝对或相对生产率在提高。美国制造业吸纳就业下降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技术变革和行业内变动。美国制造业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和创新的推陈出新，促使企业在不通过投资更多资本和更有效使用劳动力的情况促进产出。自 1987 年以来，制造业所有工人的每小时产出增加了 2.29 倍以上。相比之下，所有非农企业的生产率大约高出 1.91 倍。值得注意的是，耐用品制造商的增长甚至更大，接近 34 年前人均产出的 2.7 倍。这种趋势使得美国制造业对工人需求转向技术熟练型。从薪资方面看，1987 年至 2011 年期间，制造业就业成本指数（ECI）相对于所有行业工人的 ECI 仅下降 2%。这意味着制造业薪资并没有放缓，只是由于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导致制

制造业劳动力报酬占比的下降。美国制造业行业内部变迁是影响制造业薪酬的另一主要因素。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萎缩，整个美国制造业具有更高的资本密集度。在 1980 年至 2009 年间，只有 16% 的制造业薪资下降是由于行业间的产出份额变动而引起的，而 84% 的薪资下降是由于制造业内部变化而引起的。

（三）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参与中保持了制造业竞争力

美国跨国公司国外业务通常是对国内业务的补充而非替代，对制造业的离岸业务增加与美国制造业规模和实力增加呈正相关关系，美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与该公司在美国国内活动增加正相关。当美国公司将其国外子公司的就业人数增加 10% 时，该企业在美国本土的公司就业人数平均增加 4%。该公司在其国外子公司的支出和出口增加约 4% 时，其国内公司的研发支出增加 5.4%。由此可见，离岸制造带来的最大好处是美国研发的增加，正是美国制造业增加竞争力的核心所在。美国的跨国公司将其相对例行的制造业生产环节离岸外包，但在美国本土保留了最复杂、最个性化的生产环节。基于美国在比较高技能和非常规任务（例如创新、工程和管理）而不是常规任务（例如基本装配）上具有强大的比较优势，这种离岸外包促成了美国制造业的专业化，而这种专业化实际上在美国创造了更多高技能和更高薪的工作。此外，数量众多的美国中小企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中也不像政治家所描述的那般困难。15% 到 33% 的制造业中小企业生产成本都位于低工资国家竞争对手生产成本的中值，而生产率都高于其行业低成本竞争对手。

二、美国制造业结构性变化的特点

美国制造业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国际竞争力，不能简单将制造业变化解释为“衰退”。美国政客们用“21 世纪前十年是美国制造业毁灭的十年”等煽动性言语掩盖了制造业结构性变化的事实。美国制造业通过聚焦高端制造业，各行业不同程度的集散改变、创造新型就业岗位等方式维持了核心竞争力。

（一）行业变化：聚焦高端制造业

颠覆性技术正在彻底改变美国制造业。一直以来，美国的劳动力成本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但美国的生产率水平弥补了这一差异，3D 打印、人工智能技术以及物联网和大数据的利用提高了生产率，使美国成为高科技制造公司投资的诱人之地。2019 年，美国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从 2005 年的 4999 亿美元跃升至 17857 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制造业外国直接投资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 40%。2020 年，美国制造业产值前 8 位的制造部门是化工、电脑及电子、食品饮料及烟草、航空航天及其他运输设备、机动车辆及零部件、机械、金融制品、石油和煤炭产品。从 2021 年第一季度工业增加值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来看，前几位分别是化学产品占 1.9%、电脑及电子产品占 1.5%、食品、饮料和烟草制品占 1.3%、石油和煤炭产品占 0.8%、机动车辆及零部件占 0.8%、机械占 0.7%、航空航天及其运输设备占 0.6%。

从数据看，美国制造业中最具竞争力产业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航空航天及其运输装备行业和军工行业。这些行业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强竞争力的特点，是“制造业的皇冠”。该领域排名前十位的美国制造商即使在 2020 年疫情冲击下也大多实现了盈利增长。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收入增长 9.34%，雷神公司技术公司收入增长 24.78%，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收入增长 8.74%，洛克达因航太控股公司收入增长 4.60%，BWX 技术公司收入增长 12.06%。

第二类是汽车的设计和制作，涉及机械设备、自动化、计算机、材料等较多制造领域，体现国家制造业综合水平的行业。此类别的生产方式由传统的大批量、单品种生产向小批量、个性化生产转变，由生产者为主导的生产方式向以消费者为主导的生产方式转变。这种柔性生产有小规模、定制生产、零库存的优势。福特、通用、克莱斯勒三大汽车产业巨头普遍实行精益生产，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融

入生产线，大量新材料和电子系统应用，使得个性化生产和大规模定制得以实现。

第三类是医疗行业，制造业中创新含金量最高的行业。欧盟委员会公布的《2019 年全球企业研发投入排行榜》数据，2019 年美国有 5 家生物制药公司在全球研发强度最高企业中排名前十；根据《2019 年世界最具创新力公司榜单》，入选该榜单的 10 家生物医药领域公司全部来自美国。美国制造业的研发支出从 2000 年的 1842 亿美元增加到 2019 年的 2936 亿美元。医药占有制造业研发的 30.6%，达 898 亿美元；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占 17.9%，半导体和其他电子元件占 12.6%以及汽车和零部件占 9.2%。相比而言，劳动密集型、技术成熟型、资源消耗型行业，如皮革、造纸、印刷、塑料和橡胶、金属制品等传统或基础制造业，发展趋于稳定，年增占率为 3%以内，仅在国内保留设计、个性化定制等附加值较高的部分。

（二）空间变化：不同技术类型的制造行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集散变化

美国中等技术类制造业从大都市转向郡县。计算机和电子、运输设备、化工、机械和食品生产行业，由于其高度的专业化特性，空间上表现出新地理集群，从大都市转向郡县。这类制造业的最初地理迁移主要是寻求低工资制造业地区，主要体现为向南迁移。从 2000 年以后，美国中等技术制造商开始转向寻求集群和多样性优势的地点，而远离那些主要基于低工资的竞争优势的地点，从人口稠密、地处中心的大都市区转移至可为制造商提供最大多样性优势的郡县，形成同行业或相关行业公司的新地理集群。这种集群使制造商更容易接触到专业的工人、供应商和客户，并使他们更容易获得提高绩效的生产方法。制造商还可以受益于其所在的地理区域一系列不同的行业，更容易获得工程、金融、法律服务和企业管理咨询等服务。

美国高新技术制造业分散在各大都市区。由于高技术产业的技能、研发或供应链需求差异大，不易从产业集群和规模经济中获得益处，因此地理位置分隔开来，大多位于不同的六个大都会区：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爱荷华州锡达拉皮兹市、南纳西州克利夫兰、爱荷华州迪比克、伊利诺伊州韦恩堡和俄亥俄州曼斯菲尔德。有 52 个都市区主要聚焦制药业，61 个都市区擅长计算机和电子，44 个都市区主要从事航空航天业。

美国汽车制造业则经历了从分散到空间集中，然后再回到分散的地点进行制造的过程。最开始的空间集中阶段，目标是规模经济提高生产力，进而形成以高密度大都市区，特别是大都市区的中心县为中心的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以密歇根州主导的五大湖地区南部的东西走廊。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日益常规和成熟，这些地理集中的优势作为工业位置的決定因素变得不那么重要，生产成本相对凸显出来。于是技术密集度较低的部分在地理上变得更加分散，并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区，如外围的大都市县和非大都市县。汽车产业集群扩展至阿拉巴马州南部、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再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是高技术含量产业也会因为同样的原因分散，为接近市场和供应商，降低汽车运输成本，汽车产业在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投放更多生产线。

（三）就业岗位变化：技能型和服务型岗位融合

美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已经形成融合促进的态势，也因此改变制造业就业岗位类型。“工业 4.0”浪潮促进多种技术创新融合，为美国制造业带来批量的智能生产、经济高效的自动化工厂、可高度定制化生产的生产线。比如，物联网传感器将实时数据输入分析系统实现远程调整机器；协作机器人可处理危险任务并消除安全风险；3D 打印可生产复杂的多材料组件和最终产品；协调分布式供应商网络的新应用程序；快速仿真平台进行设计等。这对生产性服务业岗位产生巨大需求，并将其作为生产资料一部分再次投入生产，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高度融合。

美国生产性服务业岗位计入服务业岗位，但由于生产性服务业具有较高的中间需求率，其产出很大一部分是作为生产资料投入到美国制造业生产中，可以说生产性服务业岗位的增加也是制造业拉动

就业的一大体现，却没有体现在制造业增长对就业岗位的贡献中。2005 年美国生产性服务业岗位占服务业岗位的仅三分之一，2013 年该比例上升至 41.2%。这种趋势表明，美国生产性服务业是服务业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这也反映了制造业对服务业的拉动作用。这些生产性服务具有高知识技术密集度、高生产效率、高附加值的特征，在美国制造业中的广泛应用，最大程度地减少制造缺陷，提高产量并减少停机时间和浪费；改善了原材料和制成品的流程和跟踪；缩短了设计时间，并提高了工程效率，成就了美国制造业的组织模式升级。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更倾向于引入生产性服务作为外部知识源，在非价格竞争中确立优势地位。美国制造业比重下滑和服务业崛起这一产业相对变动中，实际未能体现两者的创新融合部分，割裂两者谈变化容易忽略制造业的真实境况。

三、美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真困境

美国制造业的结构性变化也带来一系列发展中的问题，美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未预期、非合意的结果，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美国制造业发展，成为其难以突破的瓶颈。

（一）“美国创造”和“美国制造”间的“死亡谷”难跨越

美国科学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未能将其基础科学的绝对优势转化为制造业创新和生产力增长的绝对优势。基础科学发展和商业创新间存在“死亡谷”的重大障碍。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认为，美国制造业领导能力的下降，并非低工资就业与低技术产业的流失，而是制造业创新能力开始落后于德国、日本等高收入国家。

究其原因在于，一是美国政府的资金支持绝大部分都局限在提升技术成熟度，而非提升制造成熟度。这导致了“美国创造力”和“美国制造力”的差异化发展。美国联邦资金绝大多数投入基础研究，主要通过能源部的先进制造办公室、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先进制造计划以及国防部的制造技术项目，对制造业技术研发提供资金。这种模式的政府资金传递，受制于衡量成功的单一标准和持续资助资格的明确指标，导致尖端项目占用大量联邦研发资金，太多的研究成果在学术和国家实验室的原型中枯萎。由于缺乏将概念验证原型移出实验室的资金，很多美国企业都在昂贵成本前却步，新技术难以扩大为商业规模生产。例如，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NIST）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等机构为解决制造能力的项目“电子复兴计划”，为期 4 年、耗资 2 亿美元，旨在重振美国的半导体制造基地。根据美国制造业协会评估，由于缺乏详细的支出数据，很难确定该计划研发预算对制造业商业转化有多大影响。美国用于提升新产品和生产工艺能力的资金相对较少。过去二十年，为最大限度地提高季度收益而削减成本的过程中，GE、IBM、施乐、AT&T 等工业巨头减少或取消企业研发实验室。据统计，美国制造业相关制造成熟度上的研发支出仅为 7.96 亿美元，远远低于日本、德国和韩国等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投资额。日本在制造成熟度相关研发方面的投入是美国的 3 倍多，德国接近 6 倍，韩国是美国的 10 倍多。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将其科学技术预算的 7-30% 用于制造成熟度研究，但美国在该方面的投资不及预算 5%。

二是美国多种旨在支持国内制造业的政策组合缺乏协调性和持续性，规模较小而局限性较大。制造扩展伙伴关系（MEP）目前包括 51 个制造中心，每个制造中心由州政府、大学或其他非盈利组织运营，帮助中小型制造商改进生产流程、提升技术能力和创新。2019 财年，环保部预算拨款为 1.4 亿美元。此项联邦支持不及德国同样功能的弗劳恩霍夫系统的六分之一，工作员工不及该系统四分之一。美国制造（MUSA）是一个由 14 个研究所组成的网络系统，每个研究所专注于特定的先进制造技术，旨在将早期的科学研究转化为制造生产。其中联邦政府提供资金较少，参与的大型制造公司、中小企业以及州和地方政府至少按 1:1 的成本分摊。2019 财年，该系统总支出 4.88 亿美元，其中仅 1.33 亿美元来自联邦政府。对这些机构的联邦拨款，为期五年，之后联邦资金就会停止，完全无法覆盖将基础科学创新转化为制造过程所需的 10 年甚至更长时间。

三是基础研发和商业可行技术开发之间阶段私人投资不足。在基础科学研发到商业可行技术开发

之间一般还有两个研发阶段：概念验证研究阶段和基础技术分析研究阶段，这两个阶段极易发生溢出效应和逆向工程，很难阻止技术创新泄露。这意味着参与研发的私人公司无法获得其个人研发的所有收益，昂贵的努力结果有高度不确定性，因此即使新产品的盈利能力相当明显，私营公司也会回避此类投资。

（二）发展高端制造业以维持技术优势竞争力与就业短期目标冲突难平衡

经济发达的国家在生产成本方面进行竞争非常困难，为保持制造业的蓬勃发展，通过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使用以释放价值是至关重要的。随着开发机器人的成本降低、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效率得以提高，这些国家可以保住制造业强国的地位。就美国而言，未来制造业有利因素在于：一是数字技术、智能制造、工业物联网在生产中的应用，通过定制产品的本地分布式生产，创造大幅提高效率并获得竞争优势；二是新生产技术和自动化的普及，将消除来自低工资劳动力的剩余成本优势，提供难以复制的竞争优势，并为美国在各种行业重新获得全球市场份额创造潜力。然而新技术也在改变所需要的工人类型和所需要的技能类型，先进制造业要求工人具有新的多学科能力，结合机械、电子和软件知识和技能，提高了工作技术门槛。若发展高端制造业，新增岗位需要熟练工人和中级技术人才，无法为不掌握熟练技术的年轻人和“铁锈带”失业工人提供岗位。

美国技术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劳动力发展的速度，技术不仅大规模替代劳动力，更需要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生产流程的灵活高技能工人。然而美国缺乏正式的工人培训体系，50 个联邦项目提供的职业培训，其中有些项目内容相互重叠，运作也不够透明，政府支持的培训和随后的就业联系并不紧密。联邦层面现有的学徒计划在实际中的效果十分有限，由于员工的流动性，制造业企业提供非企业特定工人培训的动力不足，大多企业参与只是出于社会责任，很少有企业认为该措施能帮助填补职位空缺。

从纽约州北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五大湖州到中西部的上游传统工业带，经历了数十年的工业衰退，本土低端工作岗位不断减少，使得城市蓝领中产阶级境况恶化。许多小城镇陷入了螺旋式下降，即随着工厂关闭、工资和收入下降，当地税收基础随之下降，进而当地的公共服务、学校、基础设施和执法均难以维持以往水准；有能力的人会迁往繁荣城市，但处境艰难的家庭难以承受繁荣城市的住房价格飞涨，无法离开贫困地区；这导致该地区留下的是老龄化严重、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力。这些条件为本土主义、民族主义、孤立主义和经济怀旧创造了沃土。因传统制造业的衰落而受困的居民只能在保证重建传统制造业工厂的政治家那里获得解决问题的答案。相比对劳动力再培训投资的长周期，建立低技术门槛制造业工厂，能快速拉动就业，进而成为政治作秀的惯用手段。美国地方政策制定者多会陷入短期的思维定势，向其选民宣布建立新的制造厂是政治上的胜利，通常是针对传统行业、衰落行业提供设计不当的补贴，以创造可以吸纳不掌握熟练技术的工作岗位，但却无法确保足够的经济回报。

（三）“要弹性”还是“求效率”难兼容

在构建供应链时，弹性和效率之间一直存在紧张关系。弹性可以带来安全的供应来源，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冗余和成本。原来美国企业在全球投资和采购只需要考虑一个成本因素，因此美国离岸外包制造通常意味着更便宜、更快、更灵活、更有效。然而 2018 年中美贸易争端导致的商业混乱和 2020 年疫情冲击下的供应链断裂，令美国政府和企业开始考虑和适应不可预见的系统性冲击的能力。两个最典型例子是美国国防产业和医疗产业。

2018 年 9 月，特朗普在发动中美贸易战的同时，发布 13806 号行政命令要求国防部“评估和加强美国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基地及供应链弹性”。美国国防部回应并提供了美国国防工业基地风险的全面评估，称国防工业关键部件、组件和技术的可靠性受到了威胁：目前美国国内只有一条能够生产大口径枪管的生产线；单一的国内旋转翼齿轮箱大型薄壁铸件供应商于 2016 年申请破产，使 AH-64E 阿

帕奇、V-22 鱼鹰和 CH-53K 重型替换直升机等项目面临风险；自 2010 年以来，弹药、武器、导弹和空间系统等关键防御系统的供应商数量已经下降。国防产品是由制造飞机、船舶、通信设备、武器和其他复杂产品组成，由大型国防承包商提供的高度专业化的系统生产，但这些承包商本身无法提供所有机械、电子、化学、软件等其他中间产品投入，他们依赖于其他以商业为导向的制造商。贸易战令这些国外供应链成为大型国防承包商的软肋。美国政府要求将这些产业链迁回美国，理由是国家安全和拉动就业。这涉及数量庞杂的网络化生产，虽然美国国防部的需求总体上很大，但与商业需求相比，对特定产品的国防需求可能非常小或者非常专业，以至于无法支持可靠的供应商网络基础。

2020 年疫情冲击美国企业精益化的全球供应链。优先考虑降低成本、准时生产的策略通常不考虑自然灾害、流行病或其他地缘政治危机等重大中断。疫情初期，个人防护设备、呼吸机的制造能力缺乏、基本卫生用品的有效储备不足、处方药供应严重短缺，凸显了美国产业链的短板。拜登以抗疫主张获得选民支持，上台后即发布了关于半导体芯片、电池、关键矿物和制药四个关键部门供应链的报告，要求在 100 天内评估敏感行业的供应链缺口和脆弱性。拜登同时颁布的还有“购买美国”促进制造业回流政策。这些政策最终可能会使实现更大的供应链弹性变得更加困难且成本更高。促进弹性的最佳方法是使供应来源多样化，而为了保证弹性而选择不具备制造优势的产品在美国的生产，可能会付出更昂贵，从长远来看，这可能会降低美国行业的全球竞争力。

（四）“大型跨国公司”和“中小企业”利益分化难兼顾

美国拥有众多知名制造业大型跨国公司，每年创造数以万计的财富。位居榜首的埃克森美 2017 年实现收入 2443.63 亿美元，收入增长 8.08%。苹果在 2017 年的收入为 2292.34 亿美元，收入增长 6.30%。其余美国排名前十的大型跨国公司福特汽车、通用汽车、雪佛龙、通用电气、菲利普斯、瓦莱罗能源、波音、微软在近几年均实现稳健的盈利。然而从数量上统计，美国制造业占绝大多数的是规模较小企业。2017 年，制造业有 248039 家公司，除 3914 家大型公司外，其他均是小型公司（员工少于 500 人），这些公司中有四分之三的员工少于 20 人。

在美国制造业的发展中两种形态企业出现日益分化的现象。一方面，零部件、装配和最终生产的离岸外包对大型跨国企业来说是实现季度业绩的好途径，但对中小制造企业造成了打击。跨国公司全球定位产业链，形成美国制造业中小企业的替代者和竞争者，也造成了中小企业所依赖的产业集群的地域分散，导致中小企业面临物流拥堵和全球参与等主要发展障碍。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的利益被更大制造商排挤的趋势明显。制造业的行业集中度也在不断提高，大型“超级巨星”公司蓬勃发展，但由于创新薄弱、数字化进程缓慢以及来自国外的竞争加剧，中小型企业正在苦苦挣扎。

两极分化限制了美国制造业的整体增长速率。一是大型制造商对新技术开发更感兴趣，更有能力为研究所提供配套资金，然而中小企业才是制造业对流程开发、反馈和测试的主体，对制造熟练度的提升和改进有意义的推动者。跨国公司和中小企业的利益分化进一步加剧了研发支出高和商业转化率低的情况。

二是行业集中度明显，创新垄断造成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差异分布，技术扩散到中小型企业非常困难。即使个别中小企业实现技术创新，没有资金来源也难以实现商业化规模生产，且面临大型企业出于防止技术外溢而进行的收购和吞并。小型企业艰难成长也在很多方面拖累整个美国制造业增长。在当前政治不确定性和疫情的冲击下，大型跨国公司出现供应链断裂危机，中小企业也难以形成支持供应链的基础，为美国重建国内供应链，加强本土化制造商网络集群带来挑战。

四、启示

从美国制造业的结构性变化来看，美国制造业并非“真衰落”。创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是其制造业长期健康发展和保持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美国正通过更高效的生产、更高的产能利用率、快速的设

计迭代、智能制造技术带来成本节约和利润增加超过必要投资带来的好处。将智能制造技术拓展到整个供应链,可以更紧密地整合整个生产网络,在整个价值链上拥有更高效率的生产和更好的盈利能力。随着成本下降、灵活性增加,技术实施的越快,由此产生的财富效应就越大,以此建立长期的制造业竞争优势。但从美国制造业的“真困境”中,对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以下启示:

第一,颠覆性技术也在颠覆原本制造业的地理和就业格局。美国政府关注制造业就业的改变,却无视劳动力发展在制造业的重要作用,政治后果每每在选举中体现,进而短视的走入技术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相冲突的困境。同时,美国政府忽略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得蓝州高科技区与中西部中型城市 and 较小的心脏地区城镇的利益联系断裂,形成制造业衰落的孤岛。此外,还应关注到创新技术在建立竞争力方面也是把双刃剑。智能技术能够实现快速设计迭代和产品过程模拟,也提升了竞争对手复制工艺创新的能力,加快了开发周期,降低了进入壁垒,并导致整个产品类别的快速商品化。这导致原来“美国创新、他国制造”可能逐渐转变为“他国创新、他国制造”。

第二,尖端科学发现转化为新的制造产品和制造工业需要国家战略助推。美国在科学研究方面的绝对优势未能转化为制造业创新和生产力增长的绝对优势,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在创新的商业转化和劳动力发展方面投资不足,无法获得所有收益,减缓了生产力的增长。这需要政策干预克服这些问题带来的市场失灵,同时保持支持政策的持续性和一致性,对研发提供足够期限的支持;引导建立专业的制造业机构网络,引导大学、公司、研究机构、基金会发挥重要作用,将专利组合与寻求获得尖端技术的客户进行连接,坚持不懈地专注于技术的实际应用。只有当创新技术成功地在商业上应用,制造业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时,才能使其价值转移和送达大众,使创新实现价值传递。

第三,需求在维持制造业创新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当需求高度不确定时,仅对制造研发的公共支持不太可能促成企业进行商业上的可行创新。美国国防部门制造创新的主要限制因素就是需求规模。由于国防产品的商业市场相对较小,制造商对具有国防应用的产品进行创新的动力有限,每年巨额的国防资金也难以激发创新动力。制造商在开发和商业化技术前要等到明确的市场需求,而买方一般会等待产品上市,供求间的信息温差,导致“先有鸡还是现有蛋”的困境。政府通过“创新采购政策”此类为制造商开辟市场的政策,以公共购买刺激明确需求,提供制造商部分未来回报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合理预测和实现对产品的需求刺激,才能引领制造业处于前沿地位。

第四,政府支出应直接用于生产效率更高、实际工资更高的国内制造商。政府对企业的支持应以高性能要求为约束,这是政府之手“选择赢家”避免无效和浪费的关键,比如企业单位劳工投入的附加值要高,实际工资要在同行业前三分之一,企业要提供优质的工人培训,以此为高性能的制造企业生产提供激励。要让生产优势突出、最有效率的国内制造商更可能在国内竞争中脱颖而出,并提供更符合发展趋势的技术研发和劳动力培训。

大国博弈中的中美贸易与投资合作

来源: FT 中文网(2023-03-07)

作者: 张钰函(加州大学伯克利亚太经合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

自 2018 年以来,美国一直在以产业政策、贸易壁垒以及外国投资限制等一系列保护主义政策来应对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和自身的相对衰落。在中美博弈中,这些政策自然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反击。因此,在过去几年里,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大国竞争加剧了。然而,尽管竞争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但双边贸易和投资并未减少。我们如何看待和解释这种矛盾的现象?

尽管中美贸易战仍在持续，但 2021 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 21.4%，达到 1510 亿美元。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也增长了 16.5%，达到 5060 亿美元。更值得注意的是，2021 年美国对华贸易高于此前五年的平均水平。去年双边贸易持续增长。中国仍然是美国商品进口的最大来源国，2022 年达到 5370 亿美元。同年，美国对华商品出口超过 1530 亿美元。美中双边贸易中最主要的商是机械和机械电器、化学品、塑料、橡胶和皮革制品。

不可否认，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加强了对华出口管制。尽管如此，美国工业与安全还是批准了大部分中国出口和再出口许可证申请。在 2017 年至 2021 年期间，尽管平均处理时间在五年内翻了一番，表明美国的审查确实变得更加严格；然而，批准的对华有形项目、软件和技术许可证从约 3000 个增加到近 4000 个。

在投资方面，尽管美国《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法案》和中国《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法》等监管更加严格，但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仍从 2018 年底的 354 亿美元增加到 2021 年的 385 亿美元。此外，中国在美国的风险投资从 2019 年的 23 亿美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32 亿美元。这些投资中有一半以上是在卫生、制药和生物技术领域。

与此同时，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也没有减少。2020 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为 1239 亿美元，较 2019 年增长 9.4%。仅在人工智能领域，从 2015 年到 2021 年，美国投资者就占了全球对中国公司投资交易的 17%。此外，中国人工智能公司融资总额的 37%（402 亿美元）涉及美国投资者。麦当劳、星巴克和拉尔夫·劳伦等美国跨国公司正在扩大——而不是减少——在中国的投资。

两国之间持续的贸易和投资联系的一种解释是，两国都深深嵌入全球供应链，这使得“脱钩”在近期和中期几乎不可能实现。持续双向投资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和中国市场都是巨大的。两国受利润驱动的公司都有动力继续与对方做生意。第三个原因是对外投资与贸易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我在 2018 年的学术论文“US-China Trade War: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nalysis”对此进行了证明）。最后，跨国公司（包括美国公司）仍然看好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的长期增长前景。

未来，从新自由主义经济角度看，如果中美两国都希望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中美双方都需要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加强贸易和投资。

在双边层面，不仅高层官员应该相互沟通，更重要的是，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也需要与当地社区接触。万向美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展示了如何保持负责任的跨国公司管理，并成功应对大国竞争。作为中国万向集团的子公司，该公司在美国市场进行了大量投资，包括汽车和清洁能源领域，为美国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并向 50 多所美国学校捐赠了屋顶太阳能电池板。随着更多以社区为基础的公司的出现，相互理解 and 经济相互依赖将得到巩固和加强，推动两国走向博弈中的合作均衡。

在多边层面，世界贸易组织、印太经济框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许多平台不是无效就是排他性强。然而，世界经济论坛和二十国集团峰会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为中美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个会面、沟通的平台，减少误解，纠正对彼此战略意图和政策的误判，从而建立直接的沟通渠道。例如，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最近在达沃斯发表了中国的投资演讲，明确表示“欢迎外国投资，中国的大门只会进一步打开”，这个积极的信号很可能会提振投资者的信心，促进未来双边经济进一步合作。

尽管许多人对大国竞争感到担忧，对中美关系感到十分悲观，双边贸易和投资依然存在。现在，双方应该利用双边和多边途径，进一步推进这种合作，这不仅有利于大国本身，也有利于国际社会。

国内财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 ——论厉以宁的经济学贡献

来源：爱思想网(2023-03-02)

作者：平新乔(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在全国上下都在努力要创立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其实，厉以宁教授从 1980 年代至今所出版、发表的全部论著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的重要成果。

厉以宁是江苏仪征人，1930 年出生于南京，在上海上的小学，1941 年不满 11 岁时考入上海南洋模范中学。1943 年随家迁到湘西沅陵，考上雅礼中学。1946 年回南京，在金陵大学附中完成高中。南洋模范中学、雅礼中学和金陵大学附中这三所名校奠定了厉以宁一生的事业基础。高中毕业后，厉以宁回到湖南沅陵，在一个消费合作社里当过两年会计，从而积累了与顾准、薛暮桥一样的从会计出身学习、研究经济学的宝贵经历。1951 年厉以宁考入北京大学，1955 年毕业留校。长期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系资料员，认真研读《经济史评论》等外国学术刊物上的论文，编写内部学术资料。在“文革”前就与马雍（后成为历史学者）一起翻译《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他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85 年出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系主任，1993 年任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1994-2005 年担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在 1988-2002 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七届、八届、九届常务委员，2003-2018 年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常务委员。2018 年厉以宁获得改革先锋称号。

厉以宁的经济学研究经历大体分两段：一段是从 1978 至 2000 年，即前二十二年。在这一段，厉以宁以现实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运行为主要研究对象，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和他的经济学基本理论。第二段是从 2000 年至今，即后二十二年。在这一段，厉以宁也关心、参与现实经济问题与改革发展的讨论和设计，在民营经济发展与土地确权等重大改革上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见解和政策主张，但其主要精力是在比较经济史和文化经济学的研究上，是以史为主，兼顾现实问题研究。

在 1978 年至今长达 44 年的著作生涯里，厉以宁出版、发表了 80 多部著作和数百篇论文，著述近两千万字。其思想容量之大，可与前辈学者于光远先生媲美。我认为，厉以宁的经济学研究贡献主要有五个方面：（1）、独立提出了中国经济改革思路与股份制改革设计；（2）、形成一个比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理论；（3）、提出了“三种调节与三次分配”理论；（4）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厉以宁对于外国经济史和外国经济思想史贡献了独立的、系统的研究成果；（5）、初步形成了文化经济学与经济伦理学理论框架。

在这篇文章里，我主要谈谈厉以宁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经济学理论成果，即集中于讨论厉以宁的前三个贡献。关于厉以宁教授的比较经济史研究和文化经济学贡献，当由另外的文章来加以讨论。

一，厉以宁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与股份制改革设计

这主要在于，厉以宁提出了经济改革要以企业改革为基础、为重心的思想。同时，他主张以股份

制改革来改造传统的国有企业体制，以资产交易机制来启动对于计划经济下的公有制模式的改革，这是在坚持公有制的前提下实行的对于原来的所有制结构的再改造，以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来替换原来的全民所有制的实现方式。因此，厉以宁的改革经济学理论，又称为“所有制改革论”和“股份制改革方案”。这个思想，是厉以宁在 1980 年初步酝酿、小范围建议，到 1986 年正式系统提出，并展开公开讨论的（见厉以宁：《所有制改革和股份制企业的管理》，载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1986 年第 12 期、1987 年第 1-2 期；厉以宁：《社会主义所有制体制的探索》，载于《河北学刊》1987 年第 1 期。这两篇文章都收录在厉以宁《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一书中。）。

1986 年之前，尤其是在 1984 年，中国经济学界关于经济改革的主流观点是以价格改革为中心。这个思想不但体现在大量的公开发表的论文里，而且也写进了最高决策层的决议与文件里。以价格为中心进行经济改革的主张的依据是：既然是搞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机制在本质上就是价格机制，让价格调节供求，乃是最基本的。而且，当时现实里发生的价格双轨制把经济关系搞的很乱，各种投机倒把引发腐败。因此需要理顺价格体系，消除价格双轨制。这就是价格改革。至于如何进行价格改革，是调还是放，内部又有若干分歧。

价格改革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厉以宁提出两个问题：首先，如果经济中仍然是政府经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为主体，政企不分，即使价格放开了，这类企业会对市场价格作出正确的反应吗？其次，如果作为市场的供方主要是这样的政企不分的国营企业，其所决定的价格能反映资源稀缺程度、从而改善资源配置的效率吗？

因此，厉以宁主张要将由政府经营的国有企业改为股份制企业，成为按市场调节的全民企业，以市场价值来评判企业效率，使全民所有制企业成为真正是为全体劳动者谋利的企业，真正解决经济中利益、责任、激励、动力问题。厉以宁认为，价格改革虽然也关系到经济利益与动力，但是若没有所有制改革，价格改革和其他各种改革能够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

在整个 1986 年，厉以宁就集中精力设计如何让全民所有制企业上市，成为股份制企业。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增量资产上市”与“存量资产上市”的方案。提出，国有企业改革为股份制企业可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资金增量的股份化，即新创办的企业按股份集资方式建立，以及原有企业扩大经营时采取发行股票的方式。后一阶段是资金存量的股份化，即原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核定价值，折成股份，这部分股份又可分为“国有股”和“法人股”：原有企业资金存量里由国家投资部分形成“国有股”；而原有企业资金存量里由企业本身投资部分形成“法人股”。所以，“国有股”和“法人股”是起源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存量资金的股份化，本来是为了防止在股份制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才设计的股权控制模式。后来由于国有股与法人股流转滞后，影响了资本市场深度与效率，才在 20 年后（2006 年）又进行了深化股权流转的资本市场改革。

在提出股份制改革设想的同时，在 1986 年，厉以宁还在所有制改革上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模式。不但整个国民经济是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与个体并存的混合经济，而且一个企业也可以是全民、集体与个体等多种经济所有制共同投资而组成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厉以宁还提出了“金融控股公司”的设想：即国有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对企业的参与而形成社会主义银行财团，社会主义银行财团与社会主义公司财团一起，实行跨部门、跨地区的经营。这个设想比金融控股公司大力推广的今天提前了 35 年。

对于国有企业通过股份改造后能否保持全民所有制性质的问题，厉以宁提出了国家投资公司和国家控股基金的方案。他认为，国有企业上市后，只要国有股份是有控制权的，则企业性质就还是全民所有制的。他主张，应该将国家出售的企业股份所得到的资金集中起来，形成国家基金，国家可再以此基金对别的企业与产业进行投资、控股。这实质是国有投资公司和国家控股公司的概念。

因此，在厉以宁的股份制改革思路里，不但主张全民所有制企业上市，而且对于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对于混合所有制改革和混合经济，金融控股公司、国家控股公司与国有投资公司等方面都有周密的考虑。这个思想，在 80 年代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践中都发生了重要影响。

实践证明，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格改革与企业改革是相互补充的，也说不上应该孰先孰后。事实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一方面放开了部分产品和生产资料的价格，另一方面也在国有企业推进诸如利润留成承包制的改革，还在准备股份制改革。到 1993 年，价格双轨制在中国走向尾声，而中国股市也在前一年正式开市。但厉以宁以企业改革为基础的理论，仍是成立的。他在作为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两个部分之间，即价格机制与产业组织之间，实质上认为产业组织的建设是更为根本的。价格机制说到底就是要以竞争性价格作为资源配置的信号，以价格来提高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产业组织恰恰不是完全竞争的，前苏联模式下的产业组织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体制，是根本阻遏竞争性价格机制的形成的，更谈不上让价格机制发挥作用了。由此可见，厉以宁提出改革以企业改革为中心，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这是对西方经济学在既定资源条件和既定价格机制条件下运用价格理论的主张的否定。因此，厉以宁的改革理论是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的重要创新。

后来的中国改革实践表明，价格改革是快于企业改革的步伐的。中国的价格改革从 1984 年左右起步，大约到 1994 年就基本放开价格了，即价格改革基本上是花了十年时间。可是，中国的国企改革实质是从 1995 年起才动真格进行改革，到 2007 年才基本告一段落。这说明，第一，价格改革并没有自动带来国企效率的提高，国企恰恰是在市场价格全面放开后才全面陷入困境的。说明价格改革不是改革的全部，也不是改革的中心任务。改革是中心任务是要让中国经济全面焕发出活力，而这个任务价格改革是没有担当起来的。第二，国企效益的改善，要靠企业本身的改革，而中国的实践证明，国企改革恰恰是比价格改革更艰难的改革，需要企业本身在动力机制、产权配置、劳动用工制度和治理结构上进行深入改革。第三，中国国企的改革的基本思路还是大型国有企业走股份制的道路，中小企业实行并购重组、租赁、拍卖的方式，这恰恰是厉以宁提出的企业改革思路；第四，许多重要的生产资料与要素，如煤电、盐、药品、产权价格、劳务价格、土地价格等，在 1994 年后长久没有实行市场定价，有的是双轨制，其背后与企业制度有关，需要进行深层次的制度改革。

这样看来，厉以宁在 1986 年系统提出企业改革中心论与所有制改革理论，是被中国改革实践所证实的经济改革理论，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国际意义。这个理论的国际意义在于，它说明，在社会主义改革中，对于国有企业，既不能全盘私有化，也不能在对原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原封不动的前提下就放开价格，而是要在公有制基础上对于国有资产实行市场化改造，并且在股份化过程中保持国有股的控制权，同时实行多种经济共同发展。

二，厉以宁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理论

厉以宁在 1985-1990 年系统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理论。这个理论主要是体现在其三本书里：1986 年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88 年出版的《国民经济管理学》、和 1990 年出版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

2.1.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本教科书，其贡献了到那个时期为止的最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从今天来看，这当然只是中国众多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里的一本，但是与同类教科书相比，厉以宁老师的这本书有其特色。

首先，其研究对象与理论内容有创新。厉以宁遵循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在分配上实行按劳分配这一基本原则。从劳动价值论出发，他当时还固守非生产领域不创造收入的观点；并且认为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不能成立，理由是成本属于旧价值转移，而利润属于新价值创造，两

者不能在同一个价值层面比较。然而，从总体上说，厉以宁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体系上有两大创新：第一，他主张把财富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第二，他主张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下的经济运行作为考察的重点。这样就区别于以前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其次，厉以宁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在考察经济运行过程时明确区分了“封闭型扩大再生产”的价值平衡与实物平衡，和“开放型扩大再生产”的价值平衡与实物平衡。尽管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在上世纪 80 年代在国内经济学界已比较普及，不过，厉以宁在该书里指出，无论封闭型的总供给与总需求，还是开放型的总供给与总需求，都有实物部门之间的结构问题，因此在内循环和外循环中要关注结构问题。这是中国经济学界关于“内循环”和“外循环”的最早的理论分析之一。

其三，厉以宁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里明确提出了“三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思想：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力量，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应该大力发展。当时还没有民营资本企业和外资企业，但是，集体经济与个体经济后来成为“非国有经济”与“国有经济”相对应，全民、集体经济合称“公有经济”，与个体、民营资本企业、外资企业合称的“非公经济”相对应，这都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这个思想并不是厉以宁的独创，厉以宁可贵之处在于，不仅在 1986 年的教科书里论述了多种经济共同发展，而且一直坚持并发展这一思想，在 21 世纪初成为他坚持民营经济发展的理论的出发点。

其四，厉以宁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有“四个要素”缺一不可：一是一套完善的市场体制；二是高度有效的政府；三是一批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四是符合社会主义伦理原则的经济行为规范。可见，对政府调节的评价标准不应该是“有为”，而应该是“有效”，离开有效的“有为”就是乱为。并且，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体系里，光提市场与政府是不完全的，还应该加企业家和伦理规范。

其五，什么才是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厉以宁提出了“五个市场”：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技术市场。

因此，“一个前提”（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前提）、“两个循环”（封闭与开放）、“三种经济成分”（全民、集体与个人）、“四种要素”、“五个市场”，这总起来形成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体系。

厉以宁在创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时，遇到了两个不可回避的难题：如何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发生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劳动价值论如何与作为资源配置的信号的市场经济体系相协调？

关于收入不平等问题，厉以宁从三个方面加以讨论：一是判断不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的合理程度，认为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是导致危害社会安全稳定的问题；二是非按劳分配收入差距的合理程度的判断，认为这需要适当控制；三是非正常收入方面的差异与不平等，即由财富占有不平等所引起的问题，这才是社会应引起重视与控制的。这是一个分层次、分结构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分析架构，他区分了收入的不平等与财富的不平等，认为财富的不平等才是更应该控制的；在收入不平等里又区分了按劳动分配收入与非按劳动分配收入，认为后者比前者更应该引起重视。

在劳动价值论与作为资源配置的信号的市场经济体系之间，显然有一个价值转型的理论问题。厉以宁在 1986 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提出两条研究思路：一是承认劳动价值论，但价格可围绕价值波动，价格层面就是资源配置价格，按每种资源在市场中带来的边际收益确定其收益分配水平。二是在研究中不直接涉及价值形成和价值量决定问题，也不再涉及价值与价格之间的背离问题，而是直接研究资源配置价格的决定，按资源的边际收益决定收入分配。无论是哪一种思路，都主张从要素边际贡献与要素所有者的收益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价格。这至今仍是我们的“按要素的市场贡献决

定其收益报酬”的分配原则的理论基础。

2.2. 《国民经济管理学》提出作为政府调节理论基础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宏观经济学

不同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从横的角度，以“一，二，三，四，五”的框架全方位分析社会主义经济里的企业、个人，市场和政府行为及其相互关系，《国民经济管理学》是从纵的角度，以“近期”、“中期”和“长期”这三个时间长度，讨论、分析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宏观经济学的重大问题。

厉以宁在《国民经济管理学》里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的近期任务是维持经济稳定，应当通过政府调节来维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基本平衡。这种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既是总量的，又是结构的，即要协调总量与结构之间的诸多不平衡问题。厉老师将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平衡关系分为投资、消费和国际收支这三个子领域，由于每个子领域都有供大于求、供小于求、供求相等这三种可能，所以，近期的宏观经济管理格局实质上有 27 (=) 种可能。比如，消费领域的供不应求可能会与投资领域的供过于求并存，国内消费和投资领域的供求均衡可能会与国际收支领域的不平衡并存，等等。《国民经济管理学》共讨论了 20 种短期宏观经济不平衡的格局。

这本书与国内外讨论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的诸多论著不同的最显著的特色是，在理论上第一个提出“中期”的宏观经济管理任务是解决经济结构问题。具体是三个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区域结构的转变、升级。这就是说，在客观上存在一个既非短期、又非长期的“中期宏观经济学”(Medium-Run Macroeconomics) 问题，而“中期”的形成是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时间一般需要 8-10 年，为中期。

厉以宁进一步指出，经济结构的调整，是以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为基础的。“产业结构调整、技术结构调整和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不是政府，而是企业”(《国民经济管理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 238 页)。是企业按市场需求结构变化而在生产资料市场和投资品市场上调整投资方向，才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而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又必须依托资金市场(80 年代还不提资本市场)与外贸市场、国际资本市场。这就是说，经济结构调整的实施主体、调整的手段、调整所依托的基础，都是市场导向的，而不是计划经济的导向。

同时，厉以宁教授讨论、分析了“中期”宏观经济学中产业结构变化与周期之间的关系。他思考了为什么任何产业都会有周期，即会发生上升、高峰、衰落的变化？为什么产品的发展会经历“投资增长—投资显著增长—投资热情衰退”这样的过程？发现，这样的周期不是几十年的长周期，而是中周期。“中周期”的休整阶段，就是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正在发生的时期。厉以宁还认为，中期宏观管理与短期宏观管理相比，短期管理侧重于需求管理，而中期宏观管理则侧重于供给管理；需求易增不易减，而供给易减不易增。

至于长期宏观管理，厉以宁认为应侧重于环境管理、收入水平的调节和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因此，长期的宏观经济管理是与社会管理结合在一起的，这同样已被 30 多年经济发展实践所证实。

厉以宁教授关于近期、中期和长期宏观经济管理的理论体系是一个独创。尤其是其“中期”宏观经济管理的理论，在国际学术界也是领先的。美国经济学界是在 1997 年以后才发现“中期”宏观经济学具有与短期、长期宏观调控问题不同的特殊内容(见 Blanchard (1997), Solow (2000), Beaudy (2005), Adachi, Nakamura, and Osumi (2015))。

也就是说，厉以宁教授关于“中期”宏观管理的思想，至少比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提早了 10 年以上。而且，厉以宁教授是讨论的是中国经济里的中期宏观管理问题，在内容上与西方学者后来的论述是有差异的。

2.3.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一书从方法论上为厉以宁的经济改革理论提供了基础

“非均衡”的概念并不是厉以宁的创造，它最早出现在西方经济学文献里。非均衡还是一种均衡，只是非瓦尔拉斯那种市场出清的均衡。非均衡是指不存在完善的市场，不存在灵敏的价格体系的条件下所达到的均衡。有一些凯恩斯理论的解释者认为，凯恩斯经济学就是一种最初的非均衡理论。非均衡理论在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在西方有较大的发展，来研究在市场不完善和价格机制不能自行调节供求时各种经济力量如何被调整到彼此相适合的位置，并在这个位置上达到均衡的。

厉以宁的非均衡理论并非照搬西方的非均衡理论，他首先提出两类非均衡：

第一类经济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需要或超额供给都是存在的，需求约束与供给约束都存在着，但作为市场主体的微观单位都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有自由选择权，自行承担风险。厉以宁认为，西方学者所讨论的非均衡，是这类非均衡。

但厉以宁辨别出当时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是另一类经济非均衡：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需要或超额供给都是存在的，需求约束与供给约束都存在着，但作为市场主体的微观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他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与经营方式的自主权，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与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没有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

这就是说，两种非均衡之间的区分主要是微观经济单位的性质和行为不同而造成的。这样，如果说西方的经济非均衡是由于价格与市场机制失灵造成的，那么中国的非均衡除了价格与市场机制失灵以外，还有企业作为微观经济单位是政府的附属物这一特性造成的，是市场价格体系失灵与微观经济单位不自主之间互为因果的产物。因此，厉以宁指出，中国只有通过企业改革，将国有企业改造成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微观单位，先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然后再使第一类非均衡中的非均衡程度逐步缩小。

从非均衡出发，厉以宁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又有新的发现：

（1）作为非均衡表现形式的“滞涨”，在社会主义经济里会呈现出结构复杂的“滞涨”：“涨”有公开的涨和隐蔽的“涨”（即表面上价格未变，实际上有价无货），“滞”也有公开的滞和隐蔽的“滞”（即表面上GDP增长，实际上有效供给并未增加）。所以，“滞”和“涨”的组合共有四种。在这四种组合方式下的“滞涨”，也应该采取不同的政策组合方式。

（2）中国经济的非均衡与产业结构问题有密切关系，产业结构的调整之所以困难，是与企业运行机制的弊病、企业行为短期化、以及社会行为短期化有关的。只有加速企业改革，改造企业运行机制，克服第二类非均衡中微观经济单位的弊端，才能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3）在中国的第二类非均衡经济里存在着各种“刚性”：除了“工资刚性”，“就业刚性”，“福利刚性”以外，还存在一种特殊的刚性——“企业刚性”：企业负盈不负亏，企业破产难以实现，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僵尸企业”问题。即非均衡不但表现在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上，还表现在制度市场上。

（4）非均衡会导致价格双轨制长期存在。在商品短缺条件下，如果较大的资源约束，那么即使表明上取消了两重价格（计划价格与非计划价格），但实际上会形成新的两种价格（公开价格与地下价格）之差。在条件尚未成熟之时过早全面放开价格，除可能引起社会经济动荡外，还会使一些人利用公开价格与地下价格之差牟利。

总而言之，《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一书不仅是指出了两类非均衡，更是以第二类非均衡为基础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立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从而深化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调节理论，对于中国特色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厉以宁的三种调节机制与三次分配理论

三种调节机制（或力量）与三次分配理论是厉以宁经济学的独创。是他在上世纪 90 年代的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尽管这个理论在 80 年代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里已有端倪，在那本书里也论证了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但在那里，只论述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两种调节机制，没有把道德作为“第三种调节力量”来论述，因此没有“三种调节机制”，也没有“三次分配”理论。“三种调节机制”和“三次分配”理论主要是在 1994 年出版的《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1995 年出版的《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和 1999 年出版的《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这三本书里系统加以阐述的，在 2018 年出版的《文化经济学》里也有许多论述。

3.1. 三种调节机制理论

三种调节，就是市场调节、政府调节和道德力量调节。关于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的定义，厉以宁与别人没有什么区别，他的“三种调节机制”理论的新意在于对道德力量的调节作用赋予与市场、政府相同、甚至更高的地位，同时，对市场、政府与道德力量之间的三者关系给出了新颖的论证。

厉以宁在 80 年代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里就已经提出了“第二次调节理论”。那是在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之间的关系上，他认为市场调节是第一次调节，政府调节是“第二次调节”。这就鲜明地把市场机制放在基础性的地位上，在当时已经是具有创新性的理论。在 90 年代改为“三种调节机制”理论，就不仅仅是从“二”到“三”的“加一”的变化，二是有质的飞跃。

首先，厉以宁指出，如按历史上发生的次序来排，则道德调节是先于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的。市场不过是出现在原始社会解体阶段，但在这以前，人类社会至少已存在几万年了，那时既没有市场，也没有政府，当然就没有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人类社会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是靠什么力量进行调节的呢？靠的是道德力量的调节，其中包括了习惯的调节、风俗的调节，以及共同遵守的设定或惯例的调节。这种靠道德力量作为唯一调节机制的经济就是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中所称的“习俗经济”。

其次，就是在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机制产生并起作用之后，在一些边远地区或封闭的海岛上，仍然可能是既没有市场调节，也没有政府调节（天高皇帝远）。那就只能依靠道德力量来调节经济活动。还由于人类经常发生大的战乱，“小乱居城，大乱居乡”，无论是居城还是居乡，在战乱期间，从政府到普通居民，都会设法让人类不至于饿死、冻死。道德力量调节这时仍然发挥作用。

第三，就是今天在有高度发展的市场调节机制和政府调节的法规、政策与文件的条件下，道德调节仍然是基础性的。市场调节的方式主要是定价，但定价的均衡点其实是焦距于人们内心的，价格不可能持久地离谱，人人心中有杆秤，这杆秤就是基于道德的公平。市场讲究的就是诚信。不守规矩，坑人利己，这样的市场必定是无序的。政府调节首先必须廉洁清正，从皇帝办公厅到地方政府衙门的法庭，一直是悬挂着“正大光明”的边幅的，如果没有道德调节，是不可能做到为官清正的。因此，政府调节必须建立在反腐的基础之上。

第四，社会活动分为交易领域与非交易领域，在交易领域，是市场调节、政府调节与道德力量共同调节；在非交易领域，如家庭关系、家族关系、邻居关系、同乡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关系、同事关系等，还有如学术活动、宗教活动、公益活动等，市场调节进不去，政府调节的法规只能设一个边界与底线，平时的活动主要是依靠道德力量进行调节的。

因此，厉以宁关于三种调节机制的理论，是对人类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调节机制的全方位的研究，他将“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相结合，将经济调节与道德调节相结合，实质上是将经济学与伦理学相结合，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对亚当·斯密学说中的合理内容的批判性继承。

3.2. “三次分配”学说

与“三种调节力量”或“三种调节机制”相对应，厉以宁教授提出了“三次分配”学说：

与市场调节相对应的收入分配是收入的第一次分配。收入按其构成可分为工资、薪酬、以及与工资和薪酬联系在一起的奖金、补贴等。这是由市场决定的收入分配。市场是根据各类人员所提供的生产要素的数量、质量、和效率，经过市场评价，来决定第一次分配中的各种收入水平。

社会收入的第二次分配是政府主持下的收入再分配。第二次收入分配是与政府调节相对应的，但是并不是与政府调节的全部机制相对应，而只是与政府的收入调节相对应。政府可以一方面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遗产税、赠予税、财产转移税，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对失业人员和低收入家庭、老弱病残群体进行补助、救济或津贴，来实行收入的再分配。这叫做“第二次分配”。

第三次收入分配是在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后形成的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基础上开始的，是个人出于自愿和爱心，出于社会责任感而做出的捐赠。这是基于道德力量而做出的收入再转移、再分配。显然，第三次收入分配是与道德调节机制相对应的。

厉以宁的“三次分配”学说的创新点在于：（1），他是将这三次分配置于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三种调节机制之下的，是由三种调节机制衍生出来三次分配方式；（2），厉以宁论证了第三次分配区别于第一、第二次分配的社会内涵，即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引导下，带有人情味的收入转移，而不是像市场调节下的第一次分配那种冷冰冰的生产要素转移后的收入分配，也不像政府调节那种依靠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收入转移。在第三次分配中，能增加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幸福感，即捐献人与受助人双方都能够感到幸福的一种交往过程。（3），第三次分配完全是基于个人自愿的公益活动，不像第一次分配里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是多多少少要强制服从市场价值评价才能获得属于自己的收益回报，也不像第二次分配时人们必须服从国家法律纳税，第三次分配完全是个人自主的。这样，三次分配实质上是揭示了人类在分配关系上三种不同的自由程度。（4），第三次分配实质上填补了第一、第二次分配后留下的社会空白：第一次分配发生于市场交易领域，第二次分配发生与政府法律、法规所覆盖的领域，但是社会尚有既非市场、又非政府调控所覆盖的空白区，这些广大的社会空间需要公益事业、慈善事业的发展来弥补，来投入，来支持发展，这个领域同样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为人民谋利益的重要领域。我们可以说，厉以宁的“第三次分配”理论实质是拓宽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研究领域。

厉以宁教授很早就把“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结合起来了。他在 1991 年就撰文指出，共同富裕是一个过程，不是“同步富裕”。如果是追求同步富裕，就会谁也富裕不了。不仅是“第三次分配”是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有联系，而且是三次分配里的每一次分配都与共同富裕过程有关系：在第一次分配过程里，实行按劳分配就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保证，人们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来获得收益，收入水平都会提高，而各种群体的收入水平都会提高就是共同富裕的基本含义；在第二次分配过程中，政府通过对于收入分配的事前调节，包括对个人从事投资的事前调节、对个人雇工经营的事前调节、对个人承包承租活动的事前调节、对工资标准的事前调节，对个人兼职收入的事前调节等等，都会有利于收入差距的适当缩小，从而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在第三次收入分配过程中，人们通过自愿的收入转移、自愿缴纳和自愿捐献，更会有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总之，厉以宁的经济学研究，提出了从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如何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改革的经济学理论，提出了“股份制改革”的制度设计；而且从中国实际出发，从微观、宏观和市场调节体系提出一整套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理论，尤其是提出了“中期宏观经济管理理论”和“第二种非均衡经济理论”；还将市场调节、政府调节和道德力量调节统一起来提出一个全面的社会主义经济调节理论，提出“三种调节”和“三次分配”的学说。将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与经济伦理学相结合，将对于“有形之手”的调节与“无形之手”的调节的分析相结合。这实质上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中国式的经济学理论成果。我们正处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前进。在这个历史关头，学习总结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实践中形成的中国学人自己的经济学成果，包括像厉以宁教授这样的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继续探索真

理，是会有益的。

金融改革化险应“防未病”“治已病” 有效结合

来源： 新浪网(2023-01-31)

作者： 孙天琦(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以来，一批紧迫性、全局性的突出风险点得到有效处置，金融脱实向虚、盲目扩张的局面得到扭转，金融风险整体收敛、总体可控。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不断加强金融风险识别和预警，按季度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评级。对评级较好的机构，着力建立监测预警体系，提早将潜在风险隐患消灭于萌芽状态。对“亚健康”机构，着力推动改革化险，防止劣变为高风险机构。

目前，部分地方法人机构仍属高风险银行业机构，但总体数量比峰值下降一半左右。对此，仍应采取有力措施压降存量，同时推动建立硬约束的早期纠正机制，督促增量风险限期整改，不纠正即处置，避免高风险机构淤积和区域性集中，减少金融消费者、投资者损失，减少处置中的公共资金损失。

当前银行业整体稳健，风险可控

我国银行业总资产在金融业总资产中占比超过 90%，银行稳则金融稳。央行评级结果共分 11 级，分别为 1~10 级和 D 级，数值越大则风险越高，D 级表示机构已倒闭、被接管或撤销。

2021 年四季度央行评级结果显示，参评的 4398 家银行业机构中，在安全边际内的 1~7 级机构有 4082 家，占参评机构的 93%，资产规模占参评机构的 99%。其中，24 家大型银行评级始终保持在 1~5 级的优良状态，资产规模占参评机构的 70%，是整个金融业的压舱石。8~10 级和 D 级高风险机构 316 家，资产规模仅占参评机构的 1%。但不可否认，少数机构出险带来的影响仍较为恶劣。

2018 年以来，高风险机构数量先增后降，目前已较峰值压降近五成。2018 年一季度共 420 家，2019 年三季度达到峰值 649 家后逐步下降至 2021 年四季度 316 家。目前全国 11 个省（区、市）已无高风险机构。

“防未病”和“治已病”一体抓

金融风险是不断动态演化的。评级良好机构和高风险机构处于不同的风险演化方向和阶段，风险传染的性质和烈度不同，化解方法、重点和难度也不同，须基于评级结果分类施策、分段管理，一体推进“防未病”和“治已病”。

由于金融管理部门的评级滞后性不可避免，高风险机构暴露时，风险、损失已成事实，“治已病”可能延误风险化解的最佳时机，增加风险处置成本，因此要更多关注“防未病”。

金融风险的积聚早期往往有迹可循，但有些早期异常指标容易被忽略，或被误认为是快速发展的表现。近年处置的出险机构中出现了不正常的高速扩张，市场约束、监管预警和外部审计监督失灵。

这些机构出险前，市场和金融机构或持续给予高评级，或为其承销债券股票，或斥资购买债券股票、向其发放贷款。同时，外部审计监督也基本失灵。部分案例中，会计师事务所在机构出险前长期

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各相关管理部门监管预警失效，对异常指标反应不敏锐、纠偏不及时，处置时机延误，风险不断扩大。

对 1~7 级机构建立监测预警体系

人民银行金融稳定部门通过总结高风险机构和“爆雷”工商企业出险前的异常指标特征，于 2020 年四季度针对 1~7 级银行建立预警机制，及时发现异常指标和苗头性风险，探索了基于央行评级、分类分级的风险监测预警处置框架。

预警指标涵盖扩张性风险、同业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综合风险五个方面。在指标选取上，考虑存量风险和增量风险，兼顾总量问题和结构性问题，重点关注问题比较突出的票据业务、同业业务、无网点区域的异地业务扩张、线上联合贷款、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存款和银行承兑保证金存款等领域。

预警措施上，一是发送风险警示函、约谈高管等，及时提示风险，督促银行对异常指标涉及的相关业务进行整改；二是将被预警银行纳入重点关注名单，定期跟踪其主要经营指标；三是将被预警银行异常指标情况作为央行评级和存保收费的重要参考，必要时下调评级、提高存保费率，真实反映机构风险。

2020 年四季度至 2021 年四季度，人民银行共开展 5 次银行风险预警工作，累计对评级 1~7 级的 187 家银行实施预警 274 次，发现众多典型案例。其中，预警风险类型以同业风险和扩张性风险为主，合计 224 家次，占比 82%；机构类型以农村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为主，合计 209 家次，占比 76%。

从 5 次预警来看，被预警银行大部分集中在 4~7 级。其中，超过七成的被预警银行在随后两个季度内即退出预警名单。例如某银行的域外贷款占比从 43%降至当年末 25%等。

实践发现，抓早抓小“防未病”，在银行评级尚好时介入整改，对异常指标及时纠偏，效果明显。

重点关注安全边缘的 7 级机构

当前，部分省份的 7 级机构占比偏高，应针对性摸排 7 级机构，着力防止其劣变为高风险机构。

理论上，央行评级总体应呈正态分布，近年来评级结果也符合这一规律，其中处在安全边缘的 7 级机构占比约 15%。但有的省份尽管 8~10 级高风险机构不多，7 级机构占比却接近 50%，大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原因或在于，央行评级得分 80%源于定量指标，20%源于定性指标即主观评分。从评级迁移情况看，评级恶化下迁至 7 级的机构多为财务指标恶化、MPA 宏观审慎评估不达标等。评级从 8~10 级改善上迁至 7 级的机构多受益于地方政府专项债补充资本金，资本充足率等指标大幅改善。

需重点关注的，是主观评分较高的 7 级机构。

一方面，在评级从 1-6 级劣变至 7 级的机构中，部分机构的定量评估结果大幅下降，但依靠主观评分勉强获评 7 级，未跌入 8~10 级，其潜在风险状况可能接近高风险机构。另一方面，部分 8~10 级的高风险机构定量评估结果不佳，依靠主观评分改善至 7 级，逃离高风险机构序列。

因此，须及时防止假脱险和风险掩盖。

一是防范风险劣变。随着高风险机构不断压降，一些机构退出高风险序列后被评为 7 级，但大多底子薄、身子弱，更需要审慎经营。一些机构从较好评级落至 7 级，是高风险机构的“后备军”，须

密切关注其日常经营管理，从源头上防止劣变。

二是杜绝高风险机构假脱险。风险化解要坚持依法合规、实事求是，坚持不良资产清洁出表、风险真实有效出清，不得做假账。

三是评级不可注水，要客观反映风险状态。一批机构得益于人为操控和粉饰，停在 7 级、堆在 7 级，高风险机构看似不多，但却严重影响金融管理部门的判断。

总体上看，高风险机构处置，要坚决避免通过不良资产假出表、假注资等方式让机构假脱险，防止高风险机构卷土重来。

早期纠正机制部分失效

200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规定，银行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的，应当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或者其行为产生严重后果的，监管部门可以通过暂停部分业务、限制分红、责令控股股东转让股权、责令调整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措施，要求银行机构纠正风险。

2012 年《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明确，监管部门可根据问题银行资本不达标的严重程度，采取逐步增强的风险纠正措施。

2015 年《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投保机构因重大资产损失等原因导致资本充足率大幅下降，严重危及存款安全以及存款保险基金安全的，投保机构应当按照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中国人民银行、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要求及时采取补充资本、控制资产增长、控制重大交易授信、降低杠杆率等措施。

尽管法律法规对早期纠正有明确规定，但部分省份落实存在难点。

早期纠正在此类省份失效，具体表现为，持续多年的高风险机构，资产规模仍每年增长 10% 至 30% 不等；高风险机构的董事长、行长还兼任其他机构的董事长、行长；部分省份允许、默许高风险机构搞创新业务，如第三方互联网存款等；早期纠正措施严重滞后，在机构资本充足水平降低的初期并未显效，导致其最终劣变为高风险机构；一些部门处置高风险机构时偏软、偏慢甚至“捂盖子”，寄希望于原班人马、原有文化、原有机制来做大资产规模甚至做新业务，把亏空补上来。

其中有主客观因素，但关键在于主观因素。

一是部分省份期望通过高风险机构继续做大规模来化解风险，启动早期纠正机制的动力不强；二是部分省份的监管部门履职不积极主动，以期在不改变公司治理、内控制度等情况下让高风险机构恢复生机，反而导致损失扩大；三是个别省份经济不景气、专业能力不够，风险化解进展较慢。

同时，早期纠正缺乏限期执行要求和强制性，也是制度有待提升之处。

国际上，为防止问题金融机构损失扩大、风险外溢，主要经济体均为早期纠正及其关键环节设置了明确的时限要求和触发条件。

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的一些条款缺乏时限要求和操作性，导致有些地方在执行时存在弹性空间。

强化早期纠正硬约束，不纠正即处置

对增量高风险机构，应探索强化早期纠正硬约束，限期整改，不纠正即处置，防止高风险机构淤积。

2022 年 4 月，人民银行金融稳定部门印发关于高风险银行硬约束早期纠正相关工作方案，先期

选取风险底数基本清晰、没有高风险机构或高风险机构数量较少的省份开展试点。

第一步是确定早期纠正机构名单，将最近一次央行评级中认定的增量高风险机构列入名单；第二步是早期纠正准备。在地方金融风险化解委员会框架下，地方政府、监管部门派出机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存款保险公司等共同研究形成备忘录，明确设置 12 个月的早期纠正期限，并强制处置未达到早期纠正目标的机构；第三步是实施早期纠正。一方面，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成立联合工作组对机构进行必要管控，支持其采取措施化险。另一方面，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强制处置工作准备；第四步是强制处置。限期未达到早期纠正目标的，监管部门会同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将积极引进战投、清理债权债务、妥善处置资产、减少风险外溢，确保风险收敛直至最终化解；第五步是追责问责。依据有关规定，适时对风险形成和风险处置中的不当行为启动问责程序。

当然，早期纠正不限于高风险机构，对资本充足率不达标等问题机构的早期纠正应更加主动、前瞻。越早着手，化险难度相对越小。

对存量高风险机构，要突出重点，有序、有效压降。重点是存量高风险机构集中的几个省份，地方政府应用好专项债补充机构资本，引进战投，推动兼并重组，优化组织结构。同时，要依法平衡好处置成本在市场和政府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当期和未来之间的分摊，有效防范道德风险。

多管齐下推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

当前，要“防未病”和“治已病”相结合，扎实推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

一是完善针对评级良好机构的预警体系，及时将风险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节约风险处置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需要注意的是，经营指标异常不代表机构一定会出险，这仅是高风险机构的必要非充分条件，有的机构可能就是“偏科生”。

应充分利用现有数据库，丰富预警指标体系，扩展定量指标，如股权集中度等；创新定性指标，如公司治理、企业文化等。要提高预警的科学性、前瞻性和精准性。同时结合央行评级、压力测试、现场评估等日常工作，深入摸排被预警机构真实风险情况，指导其及时纠偏。

二是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明确硬约束早期纠正机制的法律地位，明确时限要求，增强强制性。借鉴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经验，结合我国具体实践，在法律法规上进一步明确对高风险机构采取早期纠正的触发情形、具体措施和限期整改硬约束。

2022 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中，已明确金融机构发生监管指标异常波动等风险情形的，金融管理部门可要求其限期整改，但没有明确时限要求。《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存款保险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2020 年修改建议稿）中也均涉及早期纠正内容，但未提及限期整改，没有明确时限要求，建议金融立法、修法时给以明确。同时，对非法金融活动也要早发现、早认定、坚决处置。

三是各方合力化解风险。压实金融机构及其股东的主体责任，用机构自有资产、股东救助、引入战投等市场化渠道筹集资金开展自救。如果机构资不抵债，股东股权应依法清零，大额债权人也要依法吸收损失，行业保障基金也要发挥补充作用。地方对成立金融机构、发展金融业的积极性很高，对处置金融风险也要保持同样的积极性，落实由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风险处置机制。

同时，监管部门要切实落实监管责任，补齐监管短板，提升监管效能。存款保险基金发挥好处置平台的作用。人民银行加强流动性管理，必要时按程序给予流动性支持，依法履行好最后贷款人职责，防范系统性风险。

总体上，推进改革化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在压降存量的同时，通过硬约束早期纠正措施来减少

增量，不断压降高风险机构数量。

此外，小机构的早期纠正相对容易，应更加重视资产规模全国排名靠前的、外溢性更强的中型全国性金融机构。要不断提高监管有效性，即准入环节和持续监管环节，筑牢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

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结构和发展演化趋势，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处置体系应该包括三层，第一层为以商业银行和信贷资产为主的传统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处置体系；第二层为以非信贷资产、新型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产品为主的新型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处置体系；第三层为金融科技 Fintech 创新风险跟踪预警处置体系。其中，第二层和第三层日渐重要。

宏观上看，要有效进行逆周期调控，化解相关行业风险，提振相关区域经济，为维护金融稳定打牢宏观根基。

（本文系作者在瞭望智库“建立保障金融安全和稳定的长效机制”会议上的发言）

高储蓄之谜：疫情、恒久收入预期角度

来源： FT 中文网 (2023-03-10)

作者： 温建东，聃丘泰

近来，高储蓄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2022 年末，中国人民币存款 258.5 万亿元，全年增加 26.26 万亿元。人民币存款大增主要是住户存款增加 17.84 万亿元，同比多增 6.59 万亿元，年末余额达到 120.34 万亿元，2023 年 1 月，人民币存款延续快增趋势，增加 6.87 万亿元，同比多增 3.05 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 6.2 万亿元。

什么原因助推居民储蓄存款持续较快增长？2022 年 3 季度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专栏从 2022 年几件事说明存款相对贷款过快增加的暂时性。我们认为，认识储蓄存款变化不仅有预防性需求增加的因素、还有受阻和延迟消费、恒久收入预期下降等因素。

一、2022 年高储蓄的原因既有预防性动机又有消费受阻因素

去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名增实降。储蓄是当期消费和延期消费抉择的结果。2022 年，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4538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1.8%，扣除 CPI 全年上涨 2% 的影响，实际下降 0.2%。八类消费中，只有衣着支出和教育文化娱乐支出由于疫情影响分别下降 3.8% 和 5%。其它 5 个项目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医疗只增长 0.2%，交通和通信类 1.2%，其增速缓慢有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是因为疫情期间，防控措施限制了医疗和交通供给，加上小区封控和交通限流造成就医不便，促使许多人推迟就医和出行。疫情结束后，根据 2021 年疫情防控放松后的经验，医疗和交通通讯将会很快反弹到疫前的正常水平。

消费者信心指数随疫情而呈现一波三折。虽然疫情之初的 2020 年有所下降，但是 2021 年迅速反弹收复失地。然而，在 2022 年 3 月以后直下一个台阶，迅速从 113 下滑到 2022 年 4 月的 87，创下 32 年新低，然后一直徘徊在 89 以下，直到 11 月再创新新低 85，最新数据是 12 月的 88。

储蓄存款增速加快与消费疲软相对应。给定收入，储蓄实际上与消费是镜像关系。2022 年消费下降的同时，住户存款总计增加了 17.8 万亿，同比多增了 7.9 万亿。其中，活期存款增了 4.09 万亿，定期存款增加了 13.81 万亿，简单来说，2022 年居民储蓄倾向提高了，而且大多数存定期。

但也要看到储蓄存款尤其是活期存款为有效消费需求奠定了基础。储蓄存款定期比例先升后降。活期存款定期和存款分别代表交易价值和储藏功能。从央行公布的存款类金融机构收支月报表看,虽然如此,定期存款比例从疫前 64%逐步提高到 2021 年的 66%,2022 年 2 月后跳升 2 个百分点,2022 年 4 月-10 月徘徊在 69%附近。随后在防控措施优化后从峰值 69.22%回落,12 月疫情防控全面放松后更是迅速下降到 68.1%。这说明,2023 年有效消费需求正在释放。

二、三年疫情前后对比显示消费倾向较有韧性

追溯看,近 10 年居民收支表现具有相当大的惯性。消费理论认为消费存在惯性和棘轮效应,即消费一旦提高很难再下降。观察 2013-2022 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数据,发现一下规律:一是两者大体呈现直线上升趋势。这说明消费与当期收入相关度很高。二是收入和消费缺口逐渐加大,消费增长不及收入增长,是因为中国居民储蓄倾向一直较高,超过 30%,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其它新兴市场。三是疫情后两者缺口突加大,因为消费倾向有所下滑,尤其是 2020 年和 2022 年。四是居民 2023 年消费都会增加即使如此,储蓄存款增加趋势依然不会改变。

如果放长视线将疫情前后做一个对比,则居民消费倾向只是小幅下降。疫情之前,消费增速仅仅较名义收入增速大约低一个百分点。2021 年衣着、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消费增速分别是 1.7%、5%和 5%。其它项目都出现报复性反弹。参照国家统计局合并计算 1-2 月经济数据的做法,我们用 2022 年对比 2019 年,以便消除疫情和防控政策变化的影响。从 2019 年到 2022 年,教育文化娱乐和衣着消费分别缩减 1.8%(当然,这与国家治理教育培训机构有一定关系)和增长 0.5%。其它 6 类项目总计增长 17%,其中医疗、交通通信两类消费也都增长 12%左右,其对收入的弹性 60%。2022 年总体消费倾向 67%,较 2019 年的 70%仅仅略有下降。这一降幅,大体反映了被疫情和封控措施压抑和延迟的需求占少部分。当然,疫情期间,政府采取了许多刺激消费的政策,例如对购买新能源汽车给予了一系列优惠措施。

边际消费倾向变化规律揭示,放松管控措施后,边际消费倾向将有大幅改善。三年来,边际消费倾向受到疫情变化的影响,也是大起大落。一是边际消费倾向从疫前的 60%-75%的窄幅波动改为大幅波动,低至 2020 年的-24%,高至 2021 年的 98%。二是疫前边际消费倾向平均数为 67%。三年边际消费倾向平均数为 33%,约为原来的一半。但是如果考虑疫情前后三年时间(2019-2022 年),则边际消费倾向 49%,显示消费有相当大的韧性。三是边际消费倾向确实有报复性反弹的现象,2021 年消费支出大幅增加应该是 2020 年受到抑制和延迟的消费在封控措施放松后的释放。

从高频指标和领先指标看,消费正在稳步恢复。一般认为,消费高频包括:汽车销售、商品房销售,领先指标包括社会融资总量增速。据蜗居资讯统计,1-2 月,前 100 房企商品房销售金额同比下降 14.5%,降幅较 1 月收窄 21.1 个百分点。地产中介的诸葛找房披露,1-2 月重点 10 城二手房成交商战过山车。乘用车联合会统计,2 月前三周(1-19 日),主要厂商乘用车日均零售销量同比增长 16%,环比 1 月份下降 9%。考虑到春节因素和新能源优惠政策年初到期,这个数字还是偏乐观的。2023 年 1 月,社会融资总额同比增加 9.4%,增速有所回落。从高频数据和领先指标看,2023 年居民消费将会出复苏,消费表现好于 2022 年,但反弹力度可能不如 2021 年。

三、高储蓄的主要原因是持久收入预期下降

2022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6883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5.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2.9%。然而,2022 年实际消费未能随实际收入增长而增长,究其原因,除了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这一原因外,主要是众多因素叠加对持久收入产生了过度影响。

经济理论认为,预期在围观主体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个人整体消费决策,不仅仅与当期收入有关,还取决与对持久收入的预期。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和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都认

为，居民消费不取决于其现期收入。持久收入理论将居民收入分为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持久收入是长期平均的预期内得到的收入，而消费取决于持久收入。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认为人们会长期筹划其消费支出，以求得一生中的消费最佳配和消费效用最大化。

疫情增加了企业倒闭和失业数量，加大了相关群众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悲观预期。据企业预警通网站数据，疫情爆发的 2020 年初到 2023 年 2 月底，全国一共注销和吊销 1343 万中小微企业。此外，注销了 1000 多万的个体户。失业率从 2020 年 3 月峰值 6.2% 和 2022 年 4 月 6.1% 下降到 2023 年 2 月的 5.5%，高于疫前两年的平均水平 5% 和高点 5.3%。2022 年末，全国就业人员 73351 万人，较疫前 2019 年末 75447 万人减少了 2096 万人，降幅 2.8%。城镇就业人员 45931 万人，较 2021 年城镇就业人员 46773 万人。2019 年城镇就业人员 44247 万人。

社保赤字和延迟退休的新闻进一步加剧了老百姓的担忧，降低了退休后的收入预期。2020 年，全国社会保险首次出现收不抵支。三项社会保险基金（养老、失业、工伤保险）总收入 5.02 万亿元，总支出 5.75 万亿元，赤字 0.73 万亿，累计结余 6.13 万亿。虽然之后两年转为盈余。但考察到近 5 年年来的收支趋势，总收入从 2017 年的 5.8 万亿元上升到 2022 年的 7.1 万亿元，总支出从 2017 年的 4.9 万亿上升到 2022 年的 6.6 万亿元，发现收入增速，22% 远远跟不上支出增速 35%。近来，一些省市出现社保收不抵支的新闻，延迟退休的传闻进一步加剧了老百姓对退休收入的焦虑。这些都可能降低老百姓对持久收入的预期。

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扭转了各界对全球中长期经济前景的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3 年 1 月预测，2022-2024 年世界经济 3.4%、2.9% 和 3.1%，远远低于 2000-2019 年的平均水平 3.8%。由于疫情、长新冠和毒株变异未来不确定性，造成需求下降和预防性储蓄上升，以及劳动时间和劳动能力减少、供应链紊乱、企业倒闭生产活动的扰乱，人们预期未来经济增速下降。同时，民粹主义和国家安全考虑，以及以苹果为代表的跨国公司推进供应链多元化加剧了产业外迁的担心。人们开始担心，未来世界经济增速也可能进一步下台阶。

全球经济和我国最新暴露的问题也使各界对下调了中国中长期经济前景。大多数机构估算 2023-2030 年中国 GDP 增速会较疫前回落。2023 年 2 月，IMF 公布的第四条磋商报告有关 2023 年中国经济增速虽然从 4.4% 上调到 5.2%，但下调了未来 6 年的中国 GDP 预测。原因是房地产触顶、病毒变异不确定性、人口减少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其中，2025 年的增速下调了 0.9 个百分点，2026 年也下调了 0.9 个百分点，2027 年的增速降至 3.8%，2028 年降至 3.4%，显著低于 2023 年的 5.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比多家研究机构的预测都低。

综上所述，消费虽然在去年出现了疲软势头。但是拉长视线来看，三年疫情前后，各类消费仍然保持了很强的韧性。8 类消费中，三年疫情之后萎缩的仅有教育文化娱乐是萎缩，包括医疗的其它消费都有所增长，扣除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外，其它类别消费增速总体上保持和收入同步。而教育文化娱乐不仅仅收到疫情的影响，而受到教育领域“双减”政策的影响。因此，可以初步得出结论：如果放松疫情管控，之后报复性消费将使边际消费倾向较正常年份高出 30 个百分点。由此估计 2023 年边际消费倾向会超过 95%，使得平均消费倾向从 2022 年的 66.5% 提高到 69% 左右。尽管如此，在外部大环境不佳和内部结构性问题的掣肘下，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速的预期将会影响消费意愿，高储蓄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提振消费，不仅是出台促消费的措施，关键是要加快改革开放，解决结构性问题，提高中长期经济竞争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闻快讯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时强调正确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参加看望和讨论

来源： 新华网(2023-03-07)

作者：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3 月 6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6 日下午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他强调，党中央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要引导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正确理解党中央方针政策，增强信心、轻装上阵、大胆发展，实现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即将来临之际，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参加全国“两会”的女代表、女委员、女工作人员，向全国各族各界妇女，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女同胞、海外女侨胞，致以节日的祝贺和美好的祝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主席团会议主持人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丁薛祥参加看望和讨论。

联组会上，曾毓群、解冬、刘振东、陈小平、谢茹、孙东生等 6 位委员，围绕占领全球新能源产业制高点、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更好条件、促进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乡村产业振兴、进一步发挥民营经济优势和活力等作了发言。

习近平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很高兴来看望全国政协民建、工商联界委员，同大家一起讨论交流。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在座的各位委员，并向广大民建、工商联成员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向广大政协委员，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2022 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重要、极为关键的一年。在国际环境风高浪急和国内面临多重超预期因素冲击的情况下，经过全体人民团结奋斗、顽强拼搏，我们办成了几件事关重大、影响长远的大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共产党胜利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我们克服新冠疫情等困难挑战，如期安全顺利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我们动态优化调整防控政策措施，较短时间实现了疫情防控平稳转段，新冠病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我们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全球通胀达到 40 多年来新高的情况下，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全年经济增长 3%，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是很高的。这些成绩的取得，实属不易。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九大以来的 5 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 5 年。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急剧变化，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显著增多，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同时国内也面临新冠疫情反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等多重困难。我们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迎难而上，沉着应对，不信邪、不怕压、不避难，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2%，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5 年来的

成就，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也凝聚着广大政协委员的贡献。

习近平强调，面对国际国内环境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必须做到沉着冷静、保持定力，稳中求进、积极作为，团结一致、敢于斗争。沉着冷静、保持定力，就是要冷静观察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动，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既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及时优化调整战略策略，又保持战略定力，咬定青山不放松，不为各种风险所惧，朝着既定的战略目标，坚定不移向前进。稳中求进、积极作为，就是大方向要稳，方针政策要稳，战略部署要稳，在守住根基、稳住阵脚的基础上积极进取，不停步、能快则快，争取最好结果。团结一致、敢于斗争。力量源于团结。这些年来，我们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接踵而至，大仗一个接一个，每一仗都是靠全体人民团结奋斗、顽强斗争闯过来的。未来一个时期，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峻。只有全体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同舟共济、众志成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不断夺取新的更大胜利。

习近平指出，民营经济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我们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企业家当作自己人，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支持，在民营企业遇到困惑的时候给予指导。要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障碍，依法维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提振市场预期和信心。要积极发挥民营企业在稳就业、促增收中的重要作用，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支持平台企业在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国际竞争中尽显身手。要把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落到实处，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企业家排忧解难，让他们放开手脚，轻装上阵，专心致志搞发展。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引导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企业家正确理解党中央关于“两个毫不动摇”、“两个健康”的方针政策，消除顾虑，放下包袱，大胆发展。

习近平强调，高质量发展对民营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民营企业要践行新发展理念，深刻把握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的不足和面临的挑战，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坚守主业、做强实业，自觉走高质量发展路子。有能力、有条件的民营企业要加强自主创新，在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成果转化中发挥更大作用。要激发民间资本投资活力，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项目建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要依法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有效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竞相发展的环境。

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都必须担负促进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民营企业企业家要增强家国情怀，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强先富带后富、促进共同富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民营企业要在企业内部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推动构建全体员工利益共同体，让企业发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体员工。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企业家要筑牢依法合规经营底线，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积极参与和兴办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做到富而有责、富而有义、富而有爱。

石泰峰、何立峰、郝明金、高云龙等参加联组会。

迈向现代化强国的发展密码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时代特质和实践价值》

智库报告

解析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科学指南

来源：新华网(2023-03-02)

作者：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 1 日发布智库报告《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时代特质和实践价值》，从哲学维度、方略维度、战术维度、全球视野阐释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深刻内涵，对其进行思想探源，解析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指南。

报告认为，习近平经济思想蕴含着坚定的理想信念、鲜明的人民立场、宏大的全球视野，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矢”去射中国经济发展之“的”，标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高度。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步调一致向前进，形成强大发展合力，这是当前和未来中国经济砥砺向前的关键所在，是战胜困难、踔厉奋发的自信所在。

以五个鲜明特征作为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之钥

思想是历史的航标。

新时代 10 年来，中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国内生产总值从 54 万亿元增长到 121 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去 5 年来，中国经济经受住多重考验，在高质量发展航道上乘风破浪向前，“十四五”取得良好开局；过去 3 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 4.5%、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果；过去 1 年来，面对超预期因素，中国顶住压力，保持了经济社会大局稳定。

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深刻揭示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时代特质和实践价值》智库报告指出，从哲学维度看，习近平经济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来指导经济工作实践和探索经济建设规律，强调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中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

报告概括了“美”“实”“效”“协”“共”五个鲜明特征，作为认识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体系、思想逻辑、丰富内涵的钥匙。

美——习近平经济思想从社会主要矛盾出发，统筹需求与需要，聚焦于“美”，构建起为人民谋幸福的经济学。这种“美”，核心要义是要让全体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美”还在于生活品质的提升、民生获得感的增强和精神世界的日益丰盈，以及美丽中国与美好生活的“美美与共”。

实——习近平经济思想从劳动价值论出发，统筹经济学与哲学关于价值的双重意蕴，聚焦于“实”，构建起为民族复兴奠定更强大物质基础的经济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正是源于实实在在的劳动成果奠定了愈发坚实的物质基础。

效——习近平经济思想从经济规律和发展实际出发，统筹政府与市场，聚焦于“效”，构建起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密切配合，“有为的政府”与“有效的市场”协同发力，习近平经济思想为破解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经济学领域的世界性难题提供了全新范式。

协——习近平经济思想从新发展阶段出发,统筹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聚焦于“协”,构建起为万世开太平的经济学。“协”,意味着必须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使经济社会发展向“帕累托最优”靠近;“协”,也是“协和万邦”,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不断造福各国人民。

共——习近平经济思想从社会主义本质出发,统筹效率与公平,聚焦于“共”,构建起共同富裕、天下大同的经济学。共同富裕、共建共享、命运与共,中国不仅推动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而且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

报告指出,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和政治关系、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发展、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世界经济的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以科学方略方法指引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时代特质和实践价值》智库报告认为,从方略维度看,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为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实践路径。

以新发展阶段锚定发展新方位。报告认为,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要锚定发展新方位,以辩证思维看待新机遇新挑战。用好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当前,中国发展面临许多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报告认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中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新发展理念是一个整体,要完整把握、准确理解、全面落实,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

以新发展格局重塑发展新优势。报告认为,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国内市场主导经济循环的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中国有条件有信心以新发展格局增强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

以深化改革开放激活发展动力;以重大国家战略开辟发展空间;以统筹发展和安全把握主动权……报告聚焦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实践方略,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中国经济坚持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更加雄厚的物质基础。

习近平经济思想为什么管用、好使?报告鲜明指出,在于其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其所蕴含的把握稳和进、危和机、供和需、内和外、破和立、远和近等辩证关系,彰显大国经济治理智慧——

把握好稳和进的关系,稳中求进、以进固稳;把握好危和机的关系,危中寻机、化危为机;把握好供和需的关系,相互促进、动态平衡;把握好内和外的关系,联通内外、畅通循环;把握好破和立的关系,统筹谋划、先立后破;把握好远和近的关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报告指出,习近平经济思想增强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为做好经济工作提供科学方法和系统工具。

发展“半城郊型”经济,调研总结“晋江经验”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建设“数字福建”,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亲自关怀国产大飞机研制……报告还梳理了习近平同志在正定、福建、浙江、上海等地工作期间的若干经济治理故事,对习近平经济思想进行探源。扎实的实践探索、丰富的经验积累和深刻的理论思考,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破解全球经济发展之问贡献中国智慧

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复杂变局向人类社会发出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时代特质和实践价值》智库报告认为，习近平经济思想以历史眼光把握世界变局，创造性提出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思想，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坚持发展优先，为缩小全球鸿沟贡献中国力量

面对疫情冲击以及发展议题被政治化、边缘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六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

报告指出，中国始终坚持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用自身实践证明，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靠发展来解决。

如今，已有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全球发展倡议，近 70 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认为，全球发展倡议将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加快发展发挥催化剂作用。

——坚持互利共赢，为推动开放合作共享中国方案

“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形容开放合作的重要性。

面对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中国始终选择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报告指出，从倡议创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到打造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再到举办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中国推动形成国家级“会展矩阵”，并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努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中国如何以务实行动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让东非有了第一条高速公路，马尔代夫有了第一座跨海大桥，白俄罗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轿车制造业……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秋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如今已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

中国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稳居世界第二大进口国……报告列举了一系列详实数据，印证推动开放合作的中国方案赢得全球伙伴积极响应，为中国和世界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坚持命运与共，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中国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并深刻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倡议，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了理念指引。

报告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涵进行阐述，从全球发展倡议，到全球安全倡议，从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到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这一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完善、走深走实。

中国还通过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设立丝路基金，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等行动，致力于不断优化全球经济治理。

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报告认为，新时代中国经济的伟大成就，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大国经济治理智慧的最好诠释。中国始终把自身的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宏阔坐标系中，习近平经济思想是

世界观察中国经济、读懂中国模式、借鉴中国经验的最佳入口。

外媒述评：两会稳经济部署广受关注

来源：参考消息网(2023-03-05)

责编：余诗泉

参考消息网 3 月 5 日报道 据美联社 3 月 2 日报道，中国为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制定的议程之一是：在疫情防控措施已经调整的情况下，通过鼓励消费者增加支出重振经济。

此次 2900 多名全国人大代表出席的会议是中国今年最引人注目的政治事件。它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提供一个平台，公布政府计划。

报道称，中国领导层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让消费者和企业确信，继去年 12 月调整疫情防控措施之后，是时候消费和投资了。

报道称，中国经济正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出口遭遇全球需求疲软、美国关税引发贸易争端，还有被西方以安全为由限制获取芯片。在国内，劳动力大军已经在减少，给仍然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经济带来压力。

报道还称，消费者主导的反弹可能比刺激开支或启动房地产投资热潮需要更长的时间。但中国领导层正努力避免可能推高债务的选择方案。

另据德国之声电台网站 3 月 2 日报道，中国全国两会即将召开，加上中国调整了疫情防控措施，各方都关心两会期间是否会推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

报道引述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文章称，中国经济以反弹之势拉开了兔年的序幕，如此开局表现提高了今年全球经济实现更强劲增长的可能性，油价亦可能随之走高。数据显示，中国的经济活动已连续第二个月大幅扩张，显示出中国可能比预期更早地摆脱先前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

报道称，金融界目前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复苏仍偏向乐观看待。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暨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表示，预计中国政府将重申稳增长至关重要，政策定调积极宽松。

汪涛还说，中国政府预计会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尤其是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服务，预计政策会继续支持就业、家庭收入和消费信贷，破除阻碍消费复苏的因素。

她还提到，两会应会强调安全考量在产业政策中的重要性，科技创新政策应会着眼关键核心技术和被“卡脖子”的零部件薄弱环节，实现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

西班牙《世界报》网站 3 月 2 日报道称，中国摆脱疫情影响的速度比一些人所预测的还要快。只要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上海转一转，就会发现一切都开始像疫情之前那样流动起来。

气温回暖，市中心最国际化的街区每天都熙熙攘攘。在浦东这个金融区，商业的火车头正开足马力全速前进。

最新的数据印证了中国人正在迎接曙光：2 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升至 52.6%，创下十多年来的新高。

报道称，全国人大会议是中国最重要的年度政治会议，它将于本周末在北京开幕。届时，政府预计将公布今年的增长目标。当地媒体认为该目标在 5%至 6%之间。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 3 月 1 日的报道表示，经济分析师认为，中国最新的工厂数据创下近 11 年来的最高水平，表明经济将进一步复苏。

法国兴业银行表示：“今年房地产市场可能出现反弹，加上新冠疫情防控政策已经调整，这些将有助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提高。”

该银行是该网站调查的对象中最乐观的，其 GDP 增长预测为 5.8%。

该网站调查的经济分析师对中国今年 GDP 增长的平均预测为 5.21%。